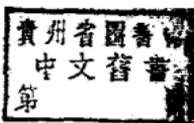


野中書齋

骨鯁集

雲杉著

文獻出版社印行



我怎樣寫起雜文來的（代序）

「五四」以後，我常常看新文藝作品，尤愛看散文、隨筆之類，而魯迅的散文，更爲我所欽服。一九二六年我在廣州。那時候正值北伐，廣州是革命的策源地，情緒尤爲緊張，報章雜誌都刊載着鼓吹革命的文章，內容無非是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我看得到有點膩厭。剛巧魯迅到廣州來了，我很盼望他能夠發表些雜感之類的文章，讓我換換口味。等了很久，不見他有文章發表，我便寫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裏躲」，投給一個報紙的副刊（叫做「新時代」），第二天就刊出來了。那篇文章的內容，無非是惹他寫文章，但沒有什麼反響。不久，我就離開廣州了。到了下一年，我在「露絲」上（？）看到魯迅的一篇文章，題爲「在鐘樓上」，是敘述他在廣州時候的情形的。文中提到我那篇「魯迅先生往那裏躲」——

「大約就在這時候，『新時代』上又發表了一篇『魯迅先生往那裏躲』，宋

雲彬先生做的。文中有這樣的對子我的警告：「他到了中大，不但不會恢復他吶喊的勇氣，並且似乎在這：在北方時受着種種壓迫，種種刺戟，到這裏來沒有壓迫和刺戟，也就無話可說了。噫嘻！異議！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裏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熱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議！魯迅先生躲避了」。而編者還很客氣，用索隱證明着這是對子我的好意的希望和德惠，並非惡意的笑罵的文章。這是很明白的，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因此也曾想如上文所說的那樣，寫一點東西，聲明我雖不吶喊，却正在辯論和開會，有時一天只喫一頓飯，有時只喫一條魚，也還未失掉了勇氣。」在雜誌上就是採定的題目。然而一則還是因為辯論和開會，二則因為篇首引有董狄克的兩句話，另外又引起我許多雜亂的感想，很想寫出，終于反而擱下了」。〔以下寫他對于葉遠寧和校波里的自發的感想，不具引。〕

元來我那篇短文居然被魯迅所注意，而且把它記下來，而且說「記得看見時頗為感動」，這使我感到意外的喜悅。那時候我頗想寫些雜感，投給「語絲」，但因爲正在替商務書館選注「資治通鑑」，終日埋頭在舊書堆裏，既無所成，也就沒有寫出什麼來。以後在「申報」的「自由談」和「立報」的「首林」裏，曾發表過些雜感，但總共也不過四五篇而已。這時候就有朋友向我勸告了：勸我多讀書，少寫這一類文章，因爲寫這類文章，容易招怨，容易買禍。朋友們好意的勸告，我當然是接受的，所以以後就沒有寫什麼。

抗戰迫使我離開上海，把我的生活方式改變了。一九三八年春天，我到了漢口，情緒緊張得很，而對於現狀頗多感慨，剛好朋友S君在香港編「立報」副刊，常常寫信來要文章，我便寫些稿成寄去。不久「國民公論」出版，他們特購「寸鐵」一欄，要求我寫些雜文，我只得勉強應命。其後國軍西撤，我轉徙到了桂林，「國民公論」在桂林繼續出版，我也常常替他們寫些雜文。那時候艾青主編「廣西日報」副刊「南方」，我覺

得他編得大方、謙嚴，便投了幾篇稿子去，陸續發表出來了，而且從此和艾青認識。他贊美我的雜文，多方鼓勵我寫。人究竟是感情的，他鼓勵我，贊美我，我對於他不免有知己之感。但此後我寫文章特別鄭重；有時候寫好了自己看看不滿意，往往丟掉；不給它發表。因為我覺得文章寫得草率，沒有內容，是對不起朋友的。一九四〇年八月「野草」出版，更多給我以發表雜文的機會。不過這一二年來，生活平淡，思路漸漸狹窄，雖然想寫，卻寫不出什麼來。

我的朋友丘君，曾經批評過我的雜文。他說，「魯迅的雜文是投槍，是匕首。他打擊敵人，總是擊中敵人的要害，給敵人以致命傷。你的雜文就沒有這種力量，你擊不中敵人的要害」。他又說，「根本原因在乎對於事物觀察得不深刻。不深刻就膚淺。所以你寫的雜文，往往淺露而少含蓄，浮泛而不深入」。這種直率的批評，我完全接受，而且很感謝他。但我以為我寫的雜文還有一種短處，就是喜歡搬弄古典陳語，說得坦白一點，有好多地方簡直是以艱深文其淺陋，使年青的讀者看了不瞭解，而學術修養較深的

人，讀了又不免齒冷。這是沒有辦法補救的，我的學力和識解力限制了我。

我雜文雖然寫不好，卻也居然引起一部分人的憎厭。曾有一位老作家，見我在寫雜文的時候，用最厭惡的神情對我說，「算了罷，寫這些老氣橫秋的文章！」我知道憎厭我的雜文的，不止這位老作家。他們的心情我是應解的：第一，我不會寫小說、劇本或詩歌，又不懂得文藝理論，只會寫些「老氣橫秋的文章」，在老作家看來，自然是不入眼的。第二，自魯迅寫下許多雜文以來，雜文也算是文藝作品了；像我這樣只寫寫雜文的，有時候也居然被錯認為文藝作家，這是有傷老作家的尊嚴的，因此對我不僅討厭，簡直憎恨了。第三，雜文總不免帶有諷刺性，有時候觸着了人家的痛癢，就引起人家的厭惡與憎恨。而第四，我世故太淺，往往憑一時興會，妄發有傷作家尊嚴的議論，使他們對我愈加憎惡；例如我曾發起研究某一作家的作品，便引起極大的反響，至今詬咒之聲，尚隱約可聞。其實這些厭惡與憎恨，也是多餘的。我沒有要做文藝家的野心，不想坐作家的交椅；文壇寬闊得很，老作家們大都久已佔定了地位，讓我在空際處小小馳騁

一下，也不見得就傷犯了作家的尊嚴，便損了作家的地位。何必這樣傷心切齒呢？

我明知道厭惡、憎恨我的人並不在少，但不想改悔，以後還要繼續寫我的雜文。理由很簡單：第一，骨硬在喉，一吐為快；第二，我相信魯迅的話，「說話說到有人厭惡，比起毫無動靜來，還是一種幸福」。

一九四二年二月于桂林

目次

奴隸篇	001
宣傳文字舉例	002
讀史雜感	002
一、東漢士風	002
二、明末士風	002
雜談兩則	002
一、研究巴金	002
二、批評態度	002
殺人方法種種	003
呼牢愁	010

辭「作家」.....	018
陶希聖眼中的契丹政客.....	019
雜談.....	019
言志.....	019
我愛孔子.....	020
辛亥革命與袁世凱.....	020
元祜黨人碑.....	021
注有典的「史外」.....	021
讀「遺書」.....	021
關於陶淵明.....	026

一、替陶淵明說話	〇六
（附）曹聚仁：「從陶潛到蔡元培」	〇七
二、從「歸去來辭」說起	〇七
三、陶淵明的「遠酒」稿	〇九
四、陶淵明之名字及其身世	〇九
憶叔琴	一〇
魯迅的戰鬥精神及其戰略	一〇
魯迅與青年	一三
從章太炎談到劉申叔	一四
回道太戈爾	一五
紀念吳檢齋	一五
回憶許地山	一六

舞動的威情、縝密的頭腦

(附)郭沫若先生來信

一三三

奴 隸 篇

魯迅說：「任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誇張，終史時候說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治一亂』。」

是的。從前人不是說過嗎？「寧為太平犬，莫作亂離人」。這便是在「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的人對於「暫時做穩了奴隸時代」的人的一種嚮往。大多數的中國人，以前做一姓一家的奴隸，近百年來，又因為「中國是各國的殖民地，要做十多個主人的奴隸」，奴隸做得太久了，便不自覺地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讚歎，撫摩，陶醉，一旦「主子」垮台，欲求做奴隸而不得，對於過去的奴隸生活便不勝其追念，甚至子連

做一匹狗都甘心的，只要天下太平。

而況「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同是奴隸，還有與、臺、隸、僕等等的分別，如果在奴隸階層裏能夠爬高得一點，可以仗「主子」的威勢來欺壓比他更低一層的奴隸的，自然更值得驕傲了。還有一種平時受「主子」豢養的奴隸，是全靠有「奴隸」的身份纔能生活的，我們浙江蕭（山）紹（興）一帶有所謂「墮民」者，一向是比「平民」更低一級的，自「五族共和」以下，會由政府明令解放，然而墮民們大不高興，原因是怕失去了「低級奴隸」的地位，或時令節，便不好意思再向主人討賞賜。

總之，「奴隸」這個名詞，雖然字面上看來不大冠冕，然而只要生活過得下去，尤其是在奴隸階層裏爬得高一點，永遠不會感覺到恥辱，不平，而意圖掙脫的。

二

然而，終于有人在不平，在叫喊了。三十年前，許多革命志士大聲疾呼，要掙脫滿洲人所加於我們的鎖鏈，而康有為卻主張保皇立憲，於是章炳麟斥之曰，「桎爲指髮，

甘與同壤，受其榮養，供其驅使，寧使漢族無自立之日，而必為滿洲謀其帝王馮世所天永命之計，何長素之無人心一至于也是也」。

康有為為什麼不贊成革命，甘心做滿清皇朝的奴隸呢？理由很簡單，如果立憲成功，康氏自己的地位，是所謂「處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這樣的高等奴隸，又何樂而不為呢？只可惜大多數的奴隸們已經起來反抗，滿清皇朝終被推翻，康有為也只好默然地帶着他的寶貴的奴隸標識——辮子，而長眠地下了。

只是我們身上的辮絛不止一副，掙脫了滿洲人所給我們帶的那一副，卻還有帝國主義者給我們帶的。所以孫中山先生臨終時告訴他的同志們說，「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而魯迅先生也告訴青年們說，「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青年的責任」。

所謂「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很明白就是沒有「奴」「主」之分的時代，而我們也的確正在努力創造——「抗戰建國」便是。

只是中國人奴隸傷得太久了，所以要掙脫奴隸籠縛還有辦法，而要拔去奴隸思想卻很困難。據說現在中國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奴隸思想似乎也確有兩種，一是封建的，一是殖民地的。譬如靡有爲一定要尊「戴活小醜」爲「聖上」，那便是封建的奴隸思想。還有一種殖民地的奴隸思想，就是只看見主子的偉大，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想倚靠他人，佔一點兒小便宜，他們根本不講革命，只要能夠維持現狀，做穩奴隸就足了。

要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須要根本拔去奴隸思想。否則無論是留學生也好，名教授也好，甚至被尊稱過「革命的外交家」者也好，儘管你表面上如何高貴，如何華貴，一旦觀其華衰，露出本相，也不過是奴隸罷了，也不過是奴隸罷了。

二十九年十月

宣傳文字舉例

抗戰以來，宣傳文字漸趨于公式化，很少看到慷慨動人的文章。記得辛亥革命前，章炳麟等曾在日本召開「支那亡國紀念會」，發表宣言，文為章氏手筆，後來收入「章氏叢書」，其中有一段動人的文章，我到現在還記得。其文曰：「願吾漢人，無忘李定國；願吾閩人，無忘鄭成功；願吾楚人，無忘張應言；願吾桂人，無忘羅式相；願吾楚人，無忘柯鵬蛟；願吾遼人，無忘李成梁」。他把各地的民族英雄，革命先烈，一一列舉，使人觸懷先哲，愴念故國，愛國復仇之念，油然而生。如果寫成一篇長文，講李定國怎樣，鄭成功怎樣，而勸大家不要忘記他們，我想功效是很少的。又如果把文字的龍手，一向自翊辭無枝葉，在這裏他偏偏不嫌繁複，這就是文章繁簡得當處。我以為現在寫宣傳文字的人，應該懂得這一些技巧才成。

讀史雜感

一·東漢士風

從前講中國歷史的人，往往稱贊東漢風俗醇美，而歸功于光武帝之表章氣節。其實光武帝的用意不外兩點：一是崇獎不事二姓者；一是優容山林隱逸，借以作新朝的點綴。而士大夫也藉此鳴清高，博聲譽。流風餘韻，直到東漢末年，但出現了一些僞君子，平時互相標榜，以增高一己聲譽，對於天下事，則搖首蹙頰，表示無可爲。這樣，本身可不參加政事鬥爭，以達其明哲保身之目的，而當時人及後人又復嘖嘖稱羨，以爲他們尚氣節，有先見。例如郭林宗，史稱其「雖善人倫而不爲危言駁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又說，「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閔得免」。這樣一個工於趨避的人，而徐孺子還要說，「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木所穩，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可憐這一類士大夫，連「棟折榱崩，僞將壓焉」的膚淺道理都沒有

邊，而也浪得大名，被稱為氣節之士！無怪幾千年來，一般士大夫在承平時候，冒沒奔驕，一到國家民族類於危殆之際，便逃避責任，而猶話自標榜，以為遺世絕俗。我們現在提高民族氣節，必先一反過去明哲保身，工趨避，善標榜的處世態度。我們所理想的氣節之士，是為國家民族，為真理而奮鬥不屈的，決不需要像郭林宗徐孺子一流的人物。

一一·明末士風

明末東林復社，相繼興起，黨弱之烈，不亞於東漢末年，然而時代究竟和東漢不同了。有明一代，北虜南倭，侵擾不休，滿洲繼起，勢尤不可當，士大夫處於夷狄猾夏之禍，所以當時政治鬥爭的對象，不僅僅是宦官與權奸，多少帶點民族主義的色彩。等到滿清入關，除了漢奸以外，大家只向一個目標去奮鬥犧牲。我們有明朝末年的士大夫，有沒有一味明哲保身，不為危言駁論的郭林宗？有沒有的以爲大樹將斃，非一本所繼，勸人家不必栖栖皇皇的徐孺子？沒有，可以說絕對沒有。何以故？東漢之末，問題不過是一姓一家的興亡，而明朝末年，却是國家民族存亡之所繫，不為危言駁論，不栖栖皇

皇，那只好等待着披髮左袵，長爲異族奴隸以告世了。所以明末清初數十年間，士大夫爲國謀光復，前仆後繼，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雖身死族覆而不悔者，不可勝數。後來清朝統治漸穩固，而如顧炎武、黃宗羲、秦之龜、王夫之、傅山、李贄、鄭奇廷等，都對新朝頗然不屈。正氣所播，一直到全明望，還是和懷兩恥，以寧儉死無失節自勵。辛亥革命前，章炳麟等所藉以鼓勵同志者，也無非數先烈之芳風，增同仇之憤慨而已。因此，就所謂氣節而論，明末士大夫之尙氣節，實遠過於東漢；而就民族優良傳統來說，那麼，這一點是最可寶貴的了。

雜談兩則

一·研究巴金

巴金先生是一位多產作家。他的作品，爲一般青年所愛讀。我們如果到書店裏去翻查一下，巴金先生的作品「春」「家」等等，銷數決不在魯迅先生的「彷徨」「吶喊」之下。而且，目前許多青年，看巴金先生的小說，大抵都能一口氣看下去，看魯迅先生的作品，怕有許多地方覺得不能深測了解的吧？

巴金先生無疑是一位成功的作家。但他的成功處在那裏，青年們爲什麼愛讀他的作品，都是值得我們研究的。也是應該研究的。因爲像這樣一位被青年所愛讀的作家，文學批評者對於他的作品，早就應該有正確的批判了。而要有正確的批判，非先從研究入手不可。

二一·批評態度

中國人缺少批評精神，口不臧否人物，一向被認為美德，批評作品，更不容易著筆。一般人看到批評的文章，就以爲是罵人。譬如甲發表一篇作品，乙寫文章來批評，丙見了，便對甲說，乙在那裏罵你了，而甲也以爲乙確是在那裏罵他。什麼是「批評」，什麼是「罵」，這界限一向就很模糊。

因此，有些人遊騎岸然地說，「我們批評的態度一定要好」！怎樣才算是「好」的態度呢？那很難說。有的說應該誠懇。不錯；但怎樣才算是誠懇呢？涕泣而道之嗎？那總算是誠懇極了，但有些場合，也不妨談笑而道之的。有的說要有熱情。不錯；但熱情的批評往往也免不了要帶點諷刺，那就不夠誠懇了。我以爲凡是批評的文字，只要能重之成理，持之有故，說話稍爲過分一點，或者帶點諷刺，也未嘗不可。記得從前科學與玄學論戰時，丁文江先生說張君勵先生是「玄學鬼」，丁張兩先生平時私交很好，也並

不會爲了這次論戰而影響到私人感情，這種批評精神和態度，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我覺得我們中國的文藝家，有時胸襟過欠闊大，往往經不起批評，一有論爭，便存芥蒂，因之所謂「批評態度」居然成了問題。我們今後只需要批評，「批評態度」還是次要問題。

殺人方法種種

有人說，人類歷史是一部「相斫書」，這是不錯的。我們翻開二十四史來看，真正太平的日子是很少的；就是真正太平盛世，也不過是沒有大規模的屠殺而已，所謂「死刑」，就一天沒有廢止過。同時因為人類比其他動物聰明，所以自相殘殺的方法，也來得巧妙而繁多。現在且不談殺人盈野，流血成河的大規模的屠殺，而就平時人殺人的種種奇妙而繁多的方法來談談。

外國史我不熟悉，單就中國史論。中國古代有所謂「三刑」，最末一條就是「大辟」，大辟者殺頭也。後又加上「要斬」，要斬者以鐵鐵圈腰切斫也（據周禮注）。這就是人類的聰明處，因為鐵頸重細也，腰肢至軟也，殺之斫之，便是俗語所謂「得其要領」。至於被殺斫斫的人的苦痛究竟如何，活着的人是無法知道的。據傳說，頭被快刀切下時，如清風過嶺一般的愉快，確否無從知道。要斬似乎更苦痛。秦皇的李丞相，因

爲一朝失去了政權，漢朝楊惲先生，爲了失去官爵，在一封信裏發點牢騷，便都親嘗了要斬的況味，不過他們好像是「一下子就死了」的，沒有什麼傳說流傳下來。記得清朝有一博科場舞弊案，那位主試者也被要斬；聽說發斬後不會立刻斷氣，還能用他的指頭蘸着血寫一「冤」字，不過他也沒有說明苦痛到怎樣程度。而且這記事見于「小說家者流」的筆記中，眼前沒有這本書，我也僅僅記憶，不能據爲信史。總之，大辟與要斬，同樣是死刑，而要斬比較更慘酷些。

殺與斬之外，還有「活埋」。考之歷史，這一種方法似乎是從「殉葬」說變出來的。你讀過詩經裏的「黃鳥」篇嗎？那位匿名詩人眼淚三位「子車先生」被人家活生生推下土坑裏去，便發出哀鳴道：

隴其穴，惻惻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但是，人和人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儘管有人覺得「惻惻其慄」；也有人在饑饉這種較靈活的苦痛，而滿足他的快樂，於是那些暴虐的君主，殘忍的武將，就從此得到

啓示，發明活埋的方法了。古代戰爭時成批俘虜被活埋，是常有的事；秦皇帝坑儒，也是一種赫赫有名的故事；其他在「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一些不幸的人，被靜悄悄的活埋地下的，古往今來，更不知有多少。

活埋雖然是殺人方法之一，但沒有被規定為刑罰的一種，而「剝皮」卻曾被定為刑罰之一，創制者是明朝的太祖高皇帝。明太祖在各府州縣衛官署的左面特立土地廟，以爲懲治貪官污吏時施行剝皮刑罰的場所，稱爲「皮場廟」。但也有人考證，元世祖抄沒阿合馬的家產時，曾抄出人皮一張，又把阿合馬的兒子阿散剝了皮，所以剝皮之法，傳自蒙古，並非國粹，這且不去管他；總之，把剝皮明定爲刑法之一的是明太祖，不是什麼元世祖。後來永樂皇帝依照家傳國法剝了那忠于建文帝的某清的皮。至于剝皮的方法，魯迅曾從「蜀道錄」裏鈔下那一條：

「剝皮者，從頭至尻，一縷裂之，張于前，如鳥展翅，率逾日始絕。有卽斃者，行刑之人坐死」。

不過這種剝皮方法不是官定的，魯迅稱之爲「沈賊式」。還有一條從屈大均的「安雅逸史」裏鈔下來的，是孫可望之永曆帝封爲秦王時，殺了陳邦傳父子，御史李如月彈劾他「擅殺勳將，無人臣禮」，給他的黨徒張應科知道了，就去報告他，他便叫張應科把李如月剝皮示衆。這一種剝皮法，便是官式的了：

「可望得應科報，即令應科殺如月，剝皮示衆。俄轉如月至朝門，有負石灰一筐，稻草一捆，置於其前。如月問，『如何用此？』其人曰，『是掖你的草！』如月叱曰，『賄奴！此株株是文章，節節是忠腸也！』既而應科立左角門階，捧可望令旨，喝如月跪。如月叱曰，『我是朝廷命官，豈聽賊令！』乃步至中門，向闕再拜。……應科促令仆地，剖脊，及臀，如月大呼曰，『死得快活，渾身清涼！』又呼可望名，大罵不絕。及斷至手足，轉前胸，猶微聲恨罵；至頸絕而死。隨以灰漬之，紕以絛，後乃入章，移北城門通衢闕上，懸之。」

剝皮之外，還有一種「烹」的方法，俗語叫做「上油鍋煎」，或稱「油炸」，也是古

已有的了，劉邦的老太爺幾幾乎要魂飛羽如法泡製了的。遠古的且不說，近古的則如明朝的永樂皇帝打到南京時，便「烹」過幾位忠于建文帝的臣子。汪有異的「史外」袁撫寫著鐵鉞的情形說：

「公（指鐵鉞）擄廢兵在淮南，爲人執以獻，總至，背立廷中，令一顧不可得，觀其車鼻，我不肯顧，盡其肉納口中，問甘否，公厲聲曰：『忠臣誰士肉何不甘！』遂碎之。昇大鏡，油數斛，投其屍，頃刻成炭灰。導屍使北面，屍揮劍外，內侍用鐵棒挾持之，使正對，笑曰：『釋今亦朝我耶？』語未畢，油湯起文餘，內侍手磨爛，棄柩走，屍仍反背如故」。

這段記事，當然有點誇張，總當議來判斷，人下了油鍋以後，那裏還會搗強撐扎呢？不過當時確實這一類酷刑的，不免大有人在，因此口耳相傳，到文人的筆下，更寫得有聲有色了。

明朝亡後，異族入主中國，那些「活埋」「剝皮」「油炸」等等方法，倒沒有很聽

真的替我們保存下來，然而古已有之的「凌遲」的刑罰，是到清末纔廢止了的。凌遲者，先把手足斬去，最後纔把喉管割斷。據陸游的考據，「五季多故，始于法外酷，凌遲一節」。宋朝熙寧、元豐間，朋黨傾軋，詔獄繁興，一些被認為口舌狂悖的，便都用凌遲的方法來處刑，從此凌遲就不是「法外特設」的條文了，一直到了清末。

此外還有所謂「車裂」的一種方法，是把人的四肢和頸項，都繫了繩子，又把繩子分別繫在牛車上，只要加上一鞭，五頭牛分頭跑去，就把人的肢體分開了，所以小說家稱之為「五牛分屍」云。這方法也是很古的，有名的商鞅先生，他的身體就是這樣被分裂了的。不過此法流傳並不久遠，始在不古之列。至于割腹挖心之類，自從比干先生身受此酷刑以來，一直到清初末年，還有張文祥、徐朝聘，那是公然見于文告，形之奏陳的。其他更有錐死、釘死等種種方法，名目繁多，不及細述。但究竟因為人類社會是在進化中的，所以要斬、活埋、劍皮、凌遲等現在早已廢止；就我們中國來說，斬行死刑的方法只說凌遲和絞兩種。然而活埋、劍皮之法，我們的敵人即所謂「倭寇」也表

，還在那裏使用——有「日寇暴行實錄」爲證。

夫殺人之目的，不外乎兩者：一則奪去被殺者的生命；一則以「死之恐怖」做戒後事。而所以要用種種下劣兇殘的方法者，也無非要使「死之恐怖」的程度增加，或發洩其以殺人爲快樂的變態性慾而已。然而我們考查歷史，以「死之恐怖」做戒後來，其效力實在是很微的。因此，有人便這樣說：「人們的苦痛是不容易相通的。因爲不易相通，殺人者便以殺人爲唯一要道，甚至于還當作快樂。然而也因爲不容易相通，所以殺人者所顯示的「死之恐怖」，仍然不能夠做戒後來，使人民永遠變作牛馬。歷史上所記的關於改革的事，總是先仆後繼者，大部分自然是由于公義，但人們天經「死之恐怖」則不容易爲「死之恐怖」所懾，我以爲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這種看法自然是對的。所以我們的古代哲人李耳先生曾說過「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的話；孟軻先生替齊建儲侯設計如何能夠「王天下」，也勸他們首先要「不嗜殺人」。情乎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從來那些暴君、酷吏以至殺亂軍人，總以殺人爲唯一要道，甚至于還當作快樂。

被殺者固然犧牲了，殺人者也往往因爲手段過于殘酷，自己也同歸毀滅。這是歷史的悲劇，但不知何時可以閉幕。

譚案：不佞略讀史書，罔知大勢，意以爲活埋這一方法，現在不會有人主張採用，而且不應該採用了，然而竟有人做文章，說「秦始皇何曾坑儒」，他所坑的只是些亂黨反動分子，「亂黨反動分子不坑，那還有國家紀綱嗎」？可見活埋這一種方法，到現在還是有人主張應該採用的。謹將全文鈔錄如左，以備參攷。原文見「民意」第一六八期，三十年三月五日出版。時爲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上距秦皇帝坑儒之年，蓋已二千一百五十有三載矣！

睥 牢 愁

漢朝的楊子雲先生是很喜歡讀「離騷」的。他曾仿「離騷」作「反離騷」，又仿「惜離」以下至「懷沙」一卷，名曰「睥牢愁」。睥牢愁亦即反離騷之意，以現代口語翻譯出來，便是「反牢騷」；睥者反也；牢騷、牢騷、離騷，右並以譏諷為韻通轉。楊先生喜歡創造特別的文題與文句，例如「勸由規矩」，到了他的筆下，便寫成「蠶連檢柙」。有人說他是以頗深文其淺陋；但我卻喜歡這個文題，因為讀看起來很別緻，同時我也是反對發牢騷的。

我以為善發牢騷的人往往是最沒出息的人（自然，像屈原那樣的發牢騷，是又當別論的）。舉例以明之：項羽和劉邦君見秦皇帝出遊，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之」，劉邦說，「大丈夫不當如是邪」，前者大有英雄氣概，他無視於秦皇帝那種赫赫的威勢，後者則頗有「遭時不遇」或「吾不猶人」之憾，牢騷氣分就很多了。所以我們如果不以威

賤賤人，那麼，姓葛的政權，究竟是讓項羽推測的，沒有姬鹿一職，劉邦如何入得關來，項羽一生，真是可歌可泣；要比劉邦有出息得多。又如司馬遷受腐刑後，寫信給任少卿，滿腹牢騷，然而他不單寫牢騷而止，他把他的遠大的計劃告訴任少卿說，「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滯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或敗與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代之書。……僕誠已若此，誠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價所辱之責，雖萬發戮，豈有悔哉」。所以他終於寫成「一部空前的中國歷史書」——太史公書，司馬遷的外孫楊惲，以失錢家居，也是滿腹牢騷，寫信給孫會宗，先說他家的全盛時代「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母爲通侯，總領從官，衆聞政事」；又做了一首歌，諷刺朝政的腐敗：「田彼南山，燕雀不治，種一頃豆，非而爲箕」。然而他既不能如賈長沙那樣上疏陳政事，痛哭流涕長嘆息；也不能像屈大夫那樣「師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而只揀着說，「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最後還無端把孫會宗罵了一頓。像這樣專發牢騷，用憤恨罵詈之詞來避

蓋其自暴自棄的行爲，無論如何，不能算是有出息的。

這種發牢騷的人，似乎從來沒有絕跡，而且大有後來居上之勢。我們翻閱漢以後的文人的集子來看，除了功成名就的幾個廟堂文學家之外，大都充滿着「懷才不遇」或「天道無知」等等抑鬱牢騷的氣分。就是現在的新文藝作品中，也還不免偶有這一類文章出現。他們先把自己縮在一個小圈子裏，以狹窄的胸懷，孤獨的心情，來觀察一切，把一己的不如意，歸咎到朋友的不肯相助，以爲人世間只有他一個人是懷着熱情的，以爲人皆負我，於是便牢騷起來了。既有牢騷，不得不發，於是或者撒些謊言，濫一己的想像，對他所不滿意的朋友來一個人身的攻訐，或者誇說一番自己過去的成績，而慨嘆於人莫我知，或者……方式多得很多，一時也說不盡。總之，他們憤恨不平，但不肯去找尋所以使他們憤恨不平的社會原因，換句話說，他們不肯也不敢正視現實，結果只剩得「肚皮牢騷」。當他們把一肚皮牢騷發洩出來時，旁人只覺得「小家氣」，而那文章的本身也限於發牢騷而已，沒有一點戰鬥的意味。

魯迅在「五四」以前，寫過一篇雜文，也是反對發牢騷的，題目叫作「恨恨而死」，現在不妨抄幾段在下面，以作本文的補充說明：

「古來很有幾位恨恨而死的人物。他們一面說些『懷才不遇』、『天道奪倫』的話，一面有錢的便狂嫖賭博，沒錢的便喝幾十碗酒——因為不平的緣故，於是後來就恨恨而死了。」

「我們應該趁他們活着的時候問他們：諸公！您知道北京離塘沽山發里，驅水去黃河幾丈麼？火藥除了做鞭炮，還除了煮風水，還有什麼用處麼？棉花是紅的，還是白的？穀子長在樹上，還是長在草上？秦關漢上如何情形，自由戀愛怎樣趨度？您在半夜裏可忽然覺得有些羞，涼席上可度幾有點悔麼？四斤的擔子您能挑麼？三里的路，您能跑麼？」

「他們如果細細的想，慢慢的悔了，這便很有些羞氣。若一越發不平，越發憤怒，那便至其能動——於是他們終於恨恨而死了。」

魯迅所指出的一些「恨恨而死的人」，就是滿腹牢騷同時也只會發牢騷的人物。世界日日在改變，現在和「五四」以前又大不相同了，鬥爭（不醫惡論或行劊）已到了最尖銳的階段，我們如果還分不清敵和友，辨不清是和非，不懂得愛和憎，模模糊糊，只替這個人發牢騷，那不必等到「恨恨而死」，早就被時代所遺棄了。

發牢騷的時代早已過去了，現在是鬥爭的時代，我們需要一片嶄新的文場，找員兒

這有關係。

「作家」

「一期『文藝新報』的『作家動態』中，曾兩次提到了我的姓名，居然把我也歸入『作家』之列，使我十分惶愧。

我不大了解『作家』一辭的含義，照字面看來，所謂『作家』者，一定發表過作品，最要能言成一家的纔成。慚愧的我生平沒有寫過什麼作品，無論是小說、戲劇或者詩。

會寫過一些所謂『雜感』，但還壓根兒不成什麼『品』的。魯迅曾說過，「凡對於時弊的舉，文字須與時弊同時滅亡，因為這正如白血輪之變成瘡癤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則當他的生命存留中，也就證明着病菌尚在」。不幸我所寫的種感，大都屢攻擊時弊，我相信這些文字，不久必與時弊同時滅亡，到那時候連種感的價值都談不上，更談不上什麼作品！既無作品，而儼然列於『作家』，經讀者不言，我獨不自愧於心乎？

其次，我認得『作家』這個頭銜，在現代中國似乎特別容易得到，而博得『作家』

頭銜的方法也特別多，或者互相選出，或者自己標榜。例如A先生在其所編的刊物中，常常提到作家B先生，而B先生在其所編的刊物中，常常提到作家A先生；這樣，兩位新「作家」，就毫不費力地互相選出了。又例如編印自己的集子，但最好是先刊一種刊物，把自己的作品源源發表出來，不管成熟與否；有機會時再選幾篇價值頗相等的「作家」，從而言之曰「我們」，發表一篇洋洋灑灑而實際卻是無的放矢的所謂「統談」；不管人家理與否，自己總算已經僥倖了「作家」，而且大名揚於國際間，豈不揚威乎！

自然，我不否認中國有不少成功的作家，尤其甚許多進步的青年作家，我對他們都十二分的敬服。但我以為不論是被動的作家或是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他們的成功，他們的有希望，都從修養上、學習上得來。由互選或標榜而得來的「作家」頭銜，終久是要被否定的。莊生有言，「水之積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楛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就譬如我，真是坳堂之上的一杯水，那裏當得起「作家」這大頭銜！許由有言曰，「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

陶希聖目中的契丹政客

由於大公報在桂林出版，我們又得看到陶希聖的文章了。最近他在「由耶律楚材說起」的一篇文章裏，對漢奸汪精衛周佛海等又大大攻擊了一番。這是好的。因為陶希聖過去和正間有過很深的關係，後來大澈大悟，跳出火坑，再頭來回罵那些至死不悟的漢奸，自然更來得精彩。

不過陶希聖以為耶律楚材沒有編殺過漢人，而且耶律楚材不是漢人，那同是漢人裏面也有許衡、劉渾、史浩諸宰降了元朝，牠們也沒有每天以綁殺爲工作以報主恩，因此他說：「這契丹政客雖沒有替元朝真正的得民心，可是他究竟沒有替元朝喪失民心，他確實替元朝推進了一些優柔的事業」，似乎對於這位「契丹政客」的勳業，有一點兒嚮往，在字裏行間分毫可以看得出來。因此我們要問：假使現在的漢奸汪周之流，不以「綁殺國人爲專攻與本務」，而一心一意地替他們的主子「推進了一些優柔的事業」，

不知陶希聖的靈感又將如何？

「契丹政教」這一個名詞很新鮮，只有聰明的陶希聖會想得出。看了這個名詞，就會想到耶律楚材以契丹後裔，替蒙古會長到中國來推進漢學專業，不免有點兒滑稽。大抵一作「政客」，便談不到什麼民族觀念，國家立場了，這一點也只有陶希聖知道得最明白吧？

雜談

顧亭林把中國歷代皇朝更易，分爲亡國家與亡天下兩種。大抵漢族自相竊代，如晉之代魏，站在魏一方面說，便是亡國家；而異族入主中夏，則是亡天下。顧氏之所謂亡天下，就是現在所說的亡國，所以有人說，中國亡過兩次國，一次亡給元朝，一次亡給清朝云云。

這兩次亡天下卽亡國的印象太慘痛了，所以當時的忠臣義士如文天祥史可法等，特別受後人的景仰與崇拜，尤其是抗戰以後，一提到民族英雄，總不外是文天祥史可法等，而葛嫩娘以至費宮人李香君等都被搬上舞臺了。借明代亡國的慘痛來作警惕，借前代的忠臣義士烈女來作激勵，是有深長意義的，但我們要注意：宋末明末那些忠義之士，大部是知其不可爲而爲之，他們所留給後人的是民族正氣，他們要後人繼續他們的

精神，發揚他們的正氣，來復興中華民族。現在我們有勝利的把握，無失敗的理由，是知其可爲而爲之。所以我們需要民族英雄的創造，遠過于對于過去失敗的民族英雄的追慕與憑吊。我們要根絕一切失敗心理。如果有人一面痛惡漢奸，一面却在想做鄭恩肖王而良，你能說他不是氣節之士嗎？然而你能設想他所潛藏着的可怕的失敗心理嗎？中國的歷史總算悠久了，抵抗異族侵略而建立豐功偉績的人，也並不少，如賈魯的謝太傅等等，爲什麼現在竟不大人提起呢？

二

也許中國的歷史太悠久了，所以中國人對於自己的歷史往往健忘。當異族入主中原的時候，總有不少氣節之士，竄身深山窮谷，誓不作新朝的順民，也就是不甘爲異族的奴隸。

當時這一類人，自然很受人崇拜。但時間一長久，事過境遷，那些氣節之士已被人忘却，大家很自然地恭稱異族的主子爲「我君」，異族的朝廷爲「我朝」，甚至于那些

氣節之士的後裔，也甘心做異族的臣僕了。我們如果翻開元史和清史稽察，儘有兒孫入大臣傳、翰林傳或文苑傳，而祖若父却是德逸得志的人物的。滿清入主中夏不到二百年，等到太平天國起來，會國勢之流就以爲這是「古今倫常之大變」，却不會想到自己甘爲異族臣僕，不惜殘殺同胞，總算是「古今倫常之大變」。清朝末年，革命黨人以民族革命相號召，幾又鬧起關東遼東的舊案，重新估定太平天國的革命價值，而會國勢之流又發憤爲「教育」，種種爲知識之舉，非漢之漢那「均章太炎語」，然而前朝遺孽即不滿三十年，一黨僑人又把民族的革命運動忘却，對會國勢之流又表示崇拜了，開口「會黨那一」，閉口「會文正」，每舉會國器英是民族英雄，是真文天祥皮可法並諸千古似的。

有人替印度人悲哀，說他們沒有一部像樣的歷史書。中國的歷史書，真是汗牛充棟，但中國人似乎太缺乏歷史觀念了，這也是可以悲哀的。

三

也有替會國藩辯護的，說他雖身為政首，但道德文章，確可作後人的模楷。文章且論，我不知道評判個人的道德與不道德，是否該從大處着眼？古人說，「大德不踰閑，德出入可也」，會國藩甘為政首，大德既虧，無論他怎樣顧全小節，都不值得稱頌。

然而中國人却往往重視小節而忽略大處，私德小有虧缺，便舉起而指駁之，必使無由自容而後已，至於醜類事仇，認賊作父的，只要他功成名遂，非但不加指摘，反來稱頌崇拜了。今人的崇拜會國藩，便是最好的例子。而中國人尤其注重文辭，「人皆曰可也，我意勿憚才」，「孔雀雖有毒，不能廢文章」，所以不僅會國藩的文章，一直受人崇拜，就是鄭孝胥的書法，汪精衛的詩詞以至周作人的散文，現在還有人在寶貴它，稱頌它。記得有人說過，「道德本也，文章末也」。然而中國人却最不肯用功夫在立身處，而大小本末上去考慮。

四

「大德不難聞，小德出入可也」那句話，細想起來，也是香毛病的。假定有一個人，他立志不作漢奸，不發國難財，而事實上他的確不做漢奸，不發國難財，可謂大德無虧了；然而他平日的私生活却很不嚴肅，窮奢極欲，姿意荒淫，這是不是應該為「小德出入可也」而加以原諒呢？而且大德的虧缺，往往從不修小節而來，即所謂「履霜豌冰至」也。

但這原是儒家的教條。儒家講折中調和，所以進德也不妨折中調和一下。漢書藝文志評論儒家說，「辟者隨時抑揚，遠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初不知儒家本以隨時抑揚立教，不僅小德可以出入，言行也可隨時變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不也是孔子之徒所說的話嗎？所以封建時代的儒家的教條，現在我們不可全盤接受，尤其不可借儒家的格言來文飾自己的過錯。

五

中國的封建制度維持了二千多年，因之中國的文化實在太古老了，需要吸收一些新

的更充實更豐富的東西，同時要排除一切舊的不合時代的成分，以趕上世界文化的水準。然而錢穆先生却說「中國文化永遠是青年性的」(詳可看十一月十六日大公報星期評論)。

錢先生是一位有名的學者，他寫的文章，自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他說，「中國民族起於黃河兩岸之大平原，此大陸農林文化之徵也。歐西文化源自希臘羅馬，是為海洋文化。二者絕不同。農村之特徵，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終子孫於斯，其質漸於斯，安土而重遷，效死而勿去。故農與民族之生命，常寄青年性。何以謂之青年性？以其爲子弟之時間也特久」。老大的古舊的中國文化，錢先生一論述，居然變爲青年性的文化了，這自然是可喜的。問題就在於：爲要保持我們的「青年性的文化」，是否應該讓中國永遠停留在農業社會這個階段裏？

過去有人說錢穆過東方文明，華陽銘先生甚至贊成劉小脾。現在復古傾向又抬頭了。東方文明故稱爲青年性的中國文化，於是乎復古不算是倒退，倒是反老還童了。

近來據說學風很壞，所以教育部有整飭學風的通令。我是喜歡翻翻舊事的。我想，學風壞，大概也是人心不古的一邊罷，那麼，我們中國古時候的學風究竟怎樣，倒值得一加查考的。

查學生干政之風，不始於今日。西漢的大學生（當時稱為太學生），為政司的處置，一下子聚集了一千多人，向丞相孔光請願，又守關上書。有名的東漢竇綰，大半是大學生鼓噪起來的。後漢對竇綰傳序云：「太學諸生三萬餘人，郭林宗、賈偉節為其冠，並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獎重」。北宋末年，金人所使，朝政不修，那些大學生又復「聚眾」起來了。宋史陳東傳云：「東字少陽，號江舟隱人。蚤有雋聲，以貢入太學。欽宗即位，率其徒伏闕上書論事。請誅蔡京、梁師成、李彥、朱勣、王黼、童貫六賊。明年，金人迫京師，李邦彥議與金和，李綱主戰，邦彥因少失利，罷綱而擢三賢。東與諸生，伏宣德門下上書，請用綱，斥邦彥，羣臣從者數萬。晝聞，傳旨慰諭，衆莫

肯去，身登開敵搦鬚之，噴呼震地。於是亟召鎮火，復偃行營，遣使撫諭，乃稍引去」。大抵當國家政治不上軌道，或外患嚴重的時候，學生就沒法安心讀書，常常做出越軌的行動來。但這種行動，後來的史家都不說是學風壞，反說是「國家養士之效」。只有朱熹，就學校制度方面，指出過宋朝太學學風的不良。他說，「熙寧以來，所謂太學者，但爲聲利之場，而掌其教導者，不過取其善爲科舉之文，師生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月書季考，祇以促其嗜利苟得，冒昧無恥之心，殊非立學教人之本意」。而最近教育部的學筋學風通令中，也說「學校來講肆之風，師生有路人之嘆」，那麼要整飭學風，似乎該從改善學校制度和教育方針上着手了。

言 志

「XX先生：八月二十七日是孔子誕辰，我們學校裏想演出一個紀念孔子的戲，請先生替我們寫個劇本，最好是獨幕劇，時間短些，因為還有其他節目也。」

XX上」。

「XX先生：來函敬悉。要寫一個紀念孔子的劇本，我碰到困難。以前林語堂先生不是爲了「子見南子」的劇本，曾受到大大的攻擊嗎？不過對於你，這覺得慶情難卻，只好勉強試試看。現在居然寫成了——是獨幕劇，正合你們的意，但不知能上演否？因爲這幕戲要節省的要能夠鼓瑟才成。要這種樂器，在現在怕不大流行呢？但在那時候，却是一種最摩登的樂器哩。這幕戲，演起來也許引不起觀衆的興味，但意思却很深長的：可以使一般人知道孔門師弟間如何融洽，說說笑笑，沒有一點猜忌，沒有一點隔膜。所以孔門弟子三千人，不曾聽到他們發生過什麼思想

問題：孔子似乎也不會派遣學生，在他們的同學間，做什麼刺探工作。現在一般做實家和一些大人先生們，老是在那裏喊「尊孔，尊孔」，我想，與其口頭喊，倒不如實際上學學孔子的教育方法。

XX復」。

上面兩封信，第一封是一個中學生寫給一位劇作家的，第二封是那劇作家的回信，我不待得到他們的許可，把原信抄來發表了；並且連那個劇本也發表了。——現在請大家看戲吧。

時——紀元前五百年頃。

地——山東曲阜

人——孔子

王路（名由）

曾皙（名點）

冉有（名求）

公西華（名赤）

暮春啓之先，我們聽到整理琴絃的聲音。暮春，孔子向外居聞磬（當然是席地而坐的），左子路、曾皙，右冉有、公西華，他們是相向而坐的。曾皙已經把琴絃整理好，開始彈起來了。

孔子：（側耳聽曾皙彈瑟，一回兒，微笑地隨坐在兩旁的門弟子。）我年紀比你們大一些，你們就對我這樣客氣。現在我們談話，大家不要拘謹。你們平時常常說人察不知道你們的才能，假使有人知道你們的才能，要來請你們去做事情，你們須做些什麼事情，換句話說，就是用什麼方法去應付呢？

子路：（匆遽地，不假思索地。）假使有一個小小的國，它跟大國相近，發生了戰爭，更加之以饑荒，只要我去治理，保管不上三年，民氣漸發，而且大國都歸得上。君

卑的道理，不但擺弄，而且安內。

孔子：（聽了子路的話，他笑了。回頭問冉有。）求，你怎麼樣？

冉有：（他態度恭敬，說話也比子路謙和多了。）有一個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地方的小國，要我去治理，大概三年光景，可使百姓不圖饑荒；至於制禮作樂，那要等比我更強有力的人去擔任，我的才力是不夠的。

孔子：亦，你怎樣？

公西赤：（他的態度比冉有更謙遜。）不敢說能夠怎樣做，但願有機會學習學習而已。

譬如在祭祀或朝聘的時候，我願穿了玄纁，戴着章甫，做一個小小的掾相。

孔子：點，你怎樣？

曾皙：（他彈的琴一曲將終，聽到孔子問他，便「鏗爾」一聲，停止了彈琴，把琴放下，立起來。）我跟他們三位論的有點不同。

孔子：那有什麼要緊呢！原不過大家談談各人的志趣而已。

曾皙：暮春三月，新的春服已經製好，約同了五六位成年的朋友，六七個小朋友，到沂水邊去舉行浴祭，小朋友們在神前舞蹈，我們唱着歌把祭品獻上去。這次祭禮舉行得又莊敬，又活潑，一切合乎禮，大家都高興。

孔子：（喟然太息。）我同情你的話！

子路、冉有、公西赤退席。曾皙重新坐下，又在理那瑟絃，有預備再彈一曲的樣子。

曾皙：夫子，他們三位的話，您覺得怎樣？

孔子：也不過各人談談各人的志趣而已，沒有什麼。

曾皙：那麼，您爲什麼聽了子路的話要笑呢？

孔子：國家需要用人起來治理，這是不錯的，但他自己的說話態度，一點不謙遜，所以我覺得好笑。

曾皙：那麼，冉有不是也想治理一個國嗎？

孔子之時，忽見得六七十里或三六十里的地方，就發不得一個國呢？

曾皙：那麼，公西赤不也是這樣嗎？

孔子：是呀！整那場功，倒說不是魯侯的功績嗎？其實他的話也太空了，他只說做一個小宰相，那算能說做大宰相呢？

曾皙：那麼……

他大概想問：那麼，您為什麼同贊我的話呢？但是他沒有說出來，又低頭搔那惡枝，彈起瑟來了。暮漸漸下。

這個戲就此演完了。後來經我查考，這劇的人是取材於論語先進章的末一段的，實際上他只把那一段文字翻譯了一下，沒有經過什麼編排。現在我把論語原文附在後面，以備參考。至於他翻譯得對不對，我是不負責任的。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赤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

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說？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懸乎大國之間，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亦，爾何如？對曰，「非曰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亦，爾何如？對曰，「非曰館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蠲尊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鐘隨，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歌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隱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隱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千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亦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之事而何？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我愛孔子

小時候在私塾裏，早就對「大成至聖先師」的諱主行敬禮，那時候我心目中的孔子，是一位道貌岸然，不容易接近的老先生。後來讀了論語、禮記之類，這種觀念漸漸改變了，覺得孔子是和藹可親的。最使我感到孔門弟子的融和和樂的，是論語先進章最後那一段記事，原文是這樣的：（按原文已見「言志」篇，茲省略。）

儒家是主張「禮治」的，他們把祭祀、朝會等等禮節看得很重。只爲子路的話說得諷口，公西華和冉有又說得太謙遜了，只有曾皙最實際，所以孔子同情他。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師弟之間，情誼十分融洽。大概孔子在平時不大以疾言厲色對他的門弟子的；除了有一次爲冉有幫助季氏聚斂，他大發脾氣說，「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此外就沒有看到他對門弟子發過什麼脾氣。孔門弟子可不少，總數三千人，常常跟他在在一起的也有七八十人，他總是「循循善誘」，從不懷疑他的弟子思想上有什麼

問題，也不會暗地裏派遣某幾個弟子去偵察同學間的思想行動。他容許弟子們隨便述說己的志趣，他的弟子也坦白地講出來，沒有什麼顧忌。這纔是大教育家的風度。我覺得孔子的和藹可親，也就在這一點。

其次，孔子所處的時代，是一個世宗尊極，實路壅塞，異說熾起，吾道不行的時代。然而孔子對於和他學說不同或主張不同的人，從來不敵視他們，有時變反而向他去學習。他曾問禮於老聃，訪樂於長弘。他問禮於老子時，老子很不客氣對他說，「去子之騷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他聽了不但沒有動氣，回來反而對他的弟子們說，「老子其猶龍乎！」他常常受那些玩世不恭的山林隱逸之流（例如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蓀丈人）的譏刺與奚落，然而他總是很平和地說「隱者也」，或說「小子識之」，從不因此而惶惶，或者想法子把那些反對他的人戴上一頂什麼帽子，送他們上斷頭台，或者捺他們到水底裏。所以孔子死後不上幾十年——就是戰國時代，各派學說騰起，而儒家本身，也分爲八派。當時「諸子爭鳴」，在中國是學術最發達、思想最自由的時代。推

論倡導之功，不能不歸於孔子。後來漢武帝以獨尊儒術爲名，實行其專制思想的統制，實在是違反孔子之道的。

爲了上述種種，我愛孔子。我希望現在滿口「尊孔」的大人先生們，須得學學孔子，即使學到一點也是好的。

辛亥革命與袁世凱

辛亥革命時我已經十多歲了，當時情形，這歷歷如在目前。那時候我已經頭過都容的「革命軍」，就思想而論，是屬於革命一派的，不過究竟年紀小，還不起了幫革命的意義。但有兩樁事使我感到痛快：第一是滿清皇朝被革掉了，第二是頭上的辮子被革掉了。在滿清皇朝未被革掉以前，我們做「作文」就很麻煩，有些字要快筆避諱，有些字要另行擡頭，稍一不慎，就要受教師的斥責（不過僅受斥責而已，還不至於發生什麼思想問題）。在辮子未革掉以前，每天早上母親要逼着我打辮子（我的辮子是每天打一次的，而且打的是「大胖辮」，據母親說，辮子鬆亂，是最不體面的事情，而大胖辮在那時候最時髦，但容易鬆亂），散去不少時間；又不當洗頭，一到夏天，頭髮裏散出一種難聞的臭氣來。還有一樁事，曾引起我極大反感，就是光緒皇帝死掉的時候，小學校的教師率領我們去遙祭什麼「大行皇帝」，事前教我們行三跪九叩首禮，還要我們做三聲

猶叫一般的哭聲，名之曰「悲哀」。祭過大行皇帝回來，我覺得了侮辱；告訴我母親，母親也非常氣憤。因此，我寫到南京孫大總統辭任，北京宣統皇帝退位的消息，快活得難以言語形容。但當時有一些做慣了奴才的遺老、遺少們，一旦失去主子，無所依傍，不免滿腹牢騷；對革命表示反感，于「遲朝」不勝倦念，我就跟他們爭辯，不管對方是「師長」或者「參謀」。所以那時候雖然快活得難以形容，但有時也因了這種辯論而百態俱備，大動肝火。有一次，我們正在跟一筐頑固老先生天開辯論，被教師Y先生聽見了，他也來參加，冷冷地對我們說，「你們不要太高興了。革命不是這樣容易成功的。一次革不成，二次，三次，也許四五次都說不定」。Y先生是我們所敬佩的老師，因為他的頭腦最清醒，思想最前進。我們聽了他的話，大家都楞住了。這些問題，我們從來沒有想到過。當時我們讀過種種革命的文告，也讀過「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知道從此中華民國的人民都享有平等自由之權。而且事實上已光復的幾個省份，言論、出版、集會、社結等等，確實很自由。記得當時臨時政府的內務部忽然頒布一種「報律」，第

二天上海各報都刊登着一篇同樣的文章，題爲「撥還內務部所定報律議」，蘇大總統看見了，便下令取消這個「報律」。這樣一個賢明的政府，這樣一位服從民意的大總統，革命還不成功嗎？所以當時我們一致認爲Y先生的話是過慮，不必十分相信他。

但後來，Y先生的話漸漸應驗了。臨時政府北遷，袁世凱做了大總統。Y先生又告訴我們，這是革命失敗的豫兆。據Y先生說，袁世凱的野心很大，而且是一個反覆無常的小人，在戊戌政變的時候，譚嗣同請他幫忙，他當面答應，暗地裏却向直隸總督榮祿去告密，把譚嗣同等賣掉了。所以Y先生斷定，袁世凱做大總統，一定會把民國弄掉的。不久就是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起來，但一忽兒便失敗了。當時我已進中學校，Y先生還在原來的小學校裏教書，還把時常帶和他見面。他說：「如何？我的話說中了。現在是二次革命，將來還有三次，四次」。

情形愈來愈壞，袁世凱想做皇帝，真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袁世凱的籍制輿論、剷除異己的手段，也愈來愈毒辣。據在所謂「首善之區」的北京朋友來信說，

北京城裏布满了袁世凱的密探，茶樓酒肆都掛着「不得妄談國事」的牌子，只要稍不留意，在什麼地方隨便發點牢騷，就被密探捕去，不知下落。名記者黃遠生，爲了不肯做袁世凱的「亞細亞日報」的主筆，趁輪船逃到美國，袁世凱派密探跟他到美國，就在舊金山把他殺死了。許多革命黨都逃在海外或隱避在上海租界上，明哲保身之士，不但不敢說話，連氣都不敢透。當時我們見不到反對的言論，聽不到憤怒不平的聲音。袁世凱的高壓、殘殺手段，換來的是一種酷烈的沉默。有一次，Y先生告訴我，這種酷烈的沉默，彷彿大風雨來臨之前的一時的靜寂，所謂「萬木無聲待雨來」，不久會有大事變發生的。他又告訴我，袁世凱那種刺探方法和殘殺手段，是從永樂皇帝和雍正皇帝那裏學來的。永樂皇帝的「瓜蔓抄」，我在歷史書上看到過；雍正皇帝之如何密布爪牙，如何殘殺異己，那Y先生知道得很多，他一一告訴了我。他說，袁世凱如果做成了皇帝，一定是一個專制魔王，不過現在世界潮流已跟三五百年前不同，要創造一個二十世紀的新君統，並不是容易的事。

Y先生的話，終於又應驗了。梁啟超在上海報紙上發表了一篇洋洋大文，題爲「萬國所附國體問題者」，打破了醜惡的沉默。原來袁世凱要做皇帝，一切都假借「民意」來進行的。最初是組織「籌安會」，討論什麼國體問題；又開什麼「約法會議」，扯談「臨時約法」；再用威脅利誘的手段，教各省推舉國民代表，上表勸進。梁啟超在那篇文裏裏，把這一幕活劇，描寫得淋漓盡致。他說：

「自國體問題發生以來，所謂討論者，皆袁氏自討自論；所謂贊成者，皆袁氏自贊自成；所謂請願者，皆袁氏自請自願；所謂表決者，皆袁氏自表自決；所謂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右手挾利刃，左手持金錢，喧察國中，最下賤無恥之少數人，如傀儡偏戲者然；由一人在幕內牽絲，而其左右十數傀儡人蠕蠕而動；此十數傀儡人者復牽第二絲，而各省長官乃至參政院復蠕蠕而動；彼長官等復牽第三絲，而千數百餘不識廉恥之輩，冒稱國民代表者蠕蠕而動」。

等到袁粉雲南起義，護國軍正式通電討袁後，梁啟超又撰文指斥袁世凱的破壞民族

道。他說：

「護國軍總司令蔡將軍之言曰：『吾儕今日不得已而有此義舉，非敢云必能救亡，庶幾爲我民爭回一人格而已』。嗚呼！我全國父老昆弟，亦知將軍此言，其中含有幾斗之血，幾斛之淚者？嗚呼！我四萬萬人之人格，至今已爲袁世凱蹂躪無復餘。袁氏自身，固不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何在，以爲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求而不得者。四年以來，北京政府嘗有所謂政治，惟此二物之動影，從橫披猖，盤旋驚灼於人入心目中而已。夫無論何國，皆中人之資居大多數。中人云者，導之善則可以向善，導之惡則可以向惡。袁氏據一國之最高權，日日以黃金誘人於前，而以白刃脅人於後，務使硬制軟化一類之人以爲之奴。自非其強立之立，其不易自拔也有固然矣。……蓋四年以來，我國士大夫之道德，實已一落千丈，其良心之麻木者，十人而七八，此無庸爲諱者也。而此罪孽誰造之？吾敢斷言之曰，袁氏一人造之

。袁氏殞破人類公共之弱點，乃專務發達此弱點以資其利用。其有能自憫其弱點而不甘受彼利用者，則必詭法屠殺之，驅逐之，鎗斃之，使其不能自存。當前清之末，袁氏執政，已專用此策以自植勢力；我國政界惡濁之空氣，實自茲播種。及其為總統，乃益煽而揚之。試思以此種人為淘汰之術，挾大力以鼓動社會，如何可當。使袁氏帝國成立，屢釀行此政策數年乃至數十年，其必善類日漸減絕，惟惡種獨能流傳，其不至使我全國人盡喪失其為人類之價值焉而不止也。

這種痛快淋漓的文章，令人一讀一擊節。不久袁世凱就在于夫所指之下，備取上賓了，共和的招牌又得繼續掛下去。但不曉得什麼緣故，過了一二年，我們前故鄉忽傳來一種流言，說袁世凱沒有死，而且曾之鑿鑿。說他是由日本人保護，逃出北京，我正在外國休養，等待時期，以便捲土重來云云。這些流言我當然不肯相信；有一次見到Y先生，我問他聽到這些流言沒有，他開玩笑似地說：

「袁世凱沒有死。他還要活下去，到中國革命真正成功的時候纔死」。

元祐黨人碑

桂林多岩洞，但古蹟似乎特別少，這也是桂林人的樸實處，不像我們江浙，只要有一個小小的土山，就會製造出許多古蹟來。然而龍隱寺裏的「元祐黨人碑」，至今依然無恙，外來遊客，到了這裏，總不免要留連一番。

我初到桂林時，曾在市肆中多方尋求這碑的拓本，後來給我找到了，可是爲了索價太貴，沒有買成。去年夏間，搬到龍隱岩附近去住，龍隱寺裏的晨鐘暮鼓，又使我記起這塊黨人碑來，結果居然在寺裏買到兩張拓本，價錢並不貴，每張桂幣五圓（值法幣二元五）。那碑是鑿在山凹處的石壁上的。寬約四英尺，長約六英尺。碑上的文字爲蔡京所手書，當時在京師立碑，再將拓本頒發各處立石，刻了因此我們還能夠在今天來賞鑒蔡京的書法。蔡京的字確乎寫得不壞，雖然偏於娟秀，缺乏遒勁氣，但如果拿汪精衛的字來相比，似乎蔡京的字例比較還有點兒骨氣。

碑上鐫的姓名，自司馬光以下凡三百九人，但我仔細數來，卻只三百八人。現在把碑文及姓名開列如下：

元祐黨籍（額，八分書，徑四寸許）

皇帝即位之五年，進即欲歷明備賞刑黜元祐諸政之臣，諸有侯爵乃命有司責其罪狀，第其首惡，其次附黨者以聞，得三百九人（注：以上五十字爲一行）

皇帝嘗而刊之石，嵌於文德殿門之東，號永爲萬世臣子之戒。又得臣京嘗之，將以頌之，天下臣竊愴，陛下仁聖英武，進制揚功彰善，舉惡以昭先烈，臣敢不對揚。

休命 仰承

陛下孝誠禮達之志，司空荷書左侯射堂門下，持節臨經京，願書

元祐黨籍

文臣

曾任宰臣執政官

司馬光故 文彥博故 曾公亮故 呂大防故 劉焯故 范純仁故 韓忠憲 曾布 梁燾故
王巖叟 蘇轍 王 存故 鄧 雍故 傅幾會故 龐 諲故 韓維故 孫 固故 范百鍊故
胡宗愈故 李清臣故 劉摯故 范純昭 安 燾 陸 佃故 賈 履故 馮海英 蔣之奇故

曾任特朝以上官

蘇 軾故 劉安世 范祖禹故 朱光庭故 姚 勗故 趙若錫故 馬 歐故 孔武仲故 孔文仲故
吳安孫故 錢 勰故 李之鼎故 孫 覺故 鮮于侁故 趙蕃若故 趙 鼎故 王欽臣故 孫 升故
李 周故 王 汾故 韓 川故 顧 應龍 賈 易 呂希純 曾 肇 王 觀 范純粹
呂 陶 王 古 豐 稷 張昇民 張 閱故 楊 長 鄭 浩 陳次升 謝文瑞
岑象求故 周 剛 徐 勣 路昌衡故 董敦逸故 上官均 葉 濂故 郭知家 楊庶國
龔 原 朱 絳 蔡祖洽 朱師復

餘官

突 觀故 賀正殿 吳棫之 張 宋 吳安詩 歐陽棗 劉唐老 王 稔 呂希哲
汪 錡故 張保胤 孔平仲故 衛 鈞 交公詩故 石百鍊 周 頤 孫 琳 范柔中
孫 康 王 康 津 詢 封賜民故 坊端修 李 傑 李 實 趙令時 郭執中

石芳	金頌	高公顯	安信之	西集	黃贊	吳安運	周永燾	高藻
張鳳	歸子輝	呂錦輝	王貫	朱柱	吳勳故	梁安國	汪古	羅德
檀國	何大咬	王波	魏敏求	江公望	會軒	高士育	鄧忠故	韓歸
韓治	郝原	梁希甫	錢景祥	周綽	何大正	呂彥祖	榮茂	沈平
曹興宗	羅理臣	劉勃	王猛	黃安期	陳國錫	于輝	黃遜	黃後五
許登輔	楊融	胡良	梅君象	冠宗顯	張房	李修	透視應故	高運俗
賈才	曹豐	侯顯道	周遠道	林廣	高輝故	宋珍俊	王公憲	王交
張謙	許安修	劉吉甫	胡清	董錦	楊道貴	倪直德	許津	王守
鄧允中	梁俊民	王揚	張裕	陳安民	葉七美	謝游	陳唐	劉應國故
楊誠故	司馬康故	宋保國故	黃隱	畢仲游	曹安民	王初	俞庚	鄭快
常立	楊國	唐德開故	余下	李格非	陳瑞	任伯龍	鄧庭堅	劉周
孫國俊	陳尋	宋光裔	蘇嘉	羅史	王得武	呂亦敏故	吳海故	陳中立故
李材	葉仲	李成原	吳海厚故	李君中	陳俊	陳誌	虞訪	李說

李傑 李之儀 范正平 曹蓋 楊錡 蘇昞 葛茂宗 劉謂 張安
 洪羽 趙天佐 李紱 屈克敏 張恕 陳井 洪錫 周鈞 甄烈
 趙誠 韓友 江洵 方道 許錫澗 李昭玘 向制 陳察 鍾正甫
 高茂舉 楊彥尋 顧正一 李茂行 彭厚 梁士龍

貳臣

張異 李儒故 王獻可故 胡田 馬懿 王履 趙希夷 任濬 郭子游
 錢盛 趙石德 王長民 李永故 王庭臣 官師雄 李愚 吳休復故 崔昌符
 潘滋 高士禮 李嘉亮 李玃 劉廷舉 絡雄 李非

內臣

梁惟簡故 陳衍故 張士貞 梁知新故 李偉故 譚辰 黃鉞 趙約 黃鼎從
 馮說 曾灝 蘇慶民 楊楷 梁弼 陳物 張成則故 張琳 梁彥臣
 李得故 閻守勲 王恭 李璣 蔡克明 王化基 王道 鄧世昌 鄭居儻
 張帖 王化臣

口惇

按：全碑共四十二行，惟自第四十一行以下模糊不可辨認。第四十二行紙縫約見一「惇」字。而第四十一行下有「章惇」的姓名，惇字作「惇」，字體拙劣，顯係後人加鐫上去的。因爲碑上明明分着「文臣」「武臣」「內臣」及「爲臣不忠曾任宰臣」四大類，每一類的姓名皆另行起，故第四十一行「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的底下不應鐫姓名，而第四十二行應有兩個姓名，第二名卽爲章惇，現在「章」字已模糊，只見一「惇」字，而好事者便在第四十一行底下補上「章惇」兩字。這樣，便可知這原有三百九人，並無錯誤，不過有一個人的姓名已模糊不可辨認了。碑的左邊尚有後人加鐫的跋，但字跡不易辨認，且亦無關重要，現在略去不說。

去年秋間，沈衡山先生來桂林，他老先生結習未忘，說要帶一點別地所沒有的紀念品回去，我就把「元祐黨人碑」的拓本送給他。把這拓本送給他老先生，我覺得是最適

合的。他看了低徊沈吟，愜然若有所感。曾在一個宴會中，大家談起這塊碑，其時我面
紅耳熱，發了一段近乎憤激的議論。我說：「平心而論，司馬光固不失爲君子，王安石
也何嘗是小人，不過一個是代表大地主，主張保守，一個是代表自由商人，急於想實現
他的改良主義，政見不同而已，人格上並沒有高潔與卑污之別。蔡京之流纔是真小人。
標榜新政，大算官帳，於是元祐朝臣，盡列黨籍。然而結果如何呢？據說，黨人的子孫
，以其祖先名列黨籍爲榮，舊碑被毀了，又重新摹刻起來。而史臣則指斥蔡京道：「廣
布私黨，嫉視人民，遂有靖康之禍」。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漢奸們的惟一長技，就是
算舊帳，挑是非，攪棍位，排異己，受其害者卻是國家民族。靖康以後，中國人民病轉
於異族淫威之下者整整二百四十多年！我們在今天撫墓這塊古碑，真有無限感慨」。不
過我發這議論時，衡山先生已回重慶去了，不知韋他老先生的感想何如。

汪有典的「史外」

近在舊書館得一書，名曰「史外」，題「潘須汪有典著」，清同治三年盧蔭翥裝山房重刊本。全書八卷。所配皆有明一代忠義氣節之士，自方正學（孝孺）以下百數十人，以「太史公書」列傳體書之，而往往參以議論。文亦萃史遷，雖力有未逮，然刻鵠不成尚類鶩。人物故事，大都可歌可泣，議論亦復慷慨激昂，時有精闢獨到處。

本書前有王夢鯨序一篇，不題年月；天津王又樸序一篇，題乾隆十三年；青州馮恩、金沙王煥序各一篇，均不題年月；又有「重刊史外小引」一篇，題「蜀南會省三」；凡例十二則，則為其門人范允袞所撰。從序、小引及凡例中，如道作者字起讓，別號訂頑，安徽含山（潘須山在含山縣境）人。家素貧，以教授生徒為業。生平喜讀「太史公書」，至淋漓痛快處，激昂慷慨，滿浮疾呼，達曙未已。年三十時，曾著有「明人事類纂」一書，都秩頗繁，以無力付梓，便專取忠義氣節之士，別成「史外」一書。所謂「

中者，蓋取胡文定公所說「史外傳心」之意。因爲他家境貧困，藏書不多，故蒐羅材料，頗得方於他的朋友沙鏡亭云。我所知道的作者事蹟，大略如此。爲想知道得詳細一點，曾向廣西省立圖書館借安徽省通志，但沒有借到；合山縣志一時更無從覓得。

作者寫定本書，當在乾隆初年，即「明史」頒布以後。范允彥在凡例中說，「迨正史頒學宮，先生乃攜是編就尊經閣下重加校對，並錄外說，益自喜，曰，是可出而問世矣」。按「明史」成書在乾隆四年，是書初版則到於乾隆十三年，可知其寫成定本時，當在乾隆四年以後十三年以前也。是書流傳似不多。我所買到的是同治間重刻本；另有同治四年陝甘公所版蜀中重刊本，牛樹梅序，廣西省立圖書館藏有一部，但不輕易出借。我曾翻查「清史稿」藝文志，此書竟未著錄！

本書作者富有種族思想，若以現代話來說，便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他生當明亡後數十年，猶緬懷前朝，低徊慷慨，不能自己。凡例中說他的祖父、父親，都以教授生徒爲業，都沒有應過新朝的考試，做過新朝的官吏。數代高風，一門亮節，真值得後人景仰

。可是作者雖稱懷明朝，而對於明代的種種設施，頗表不滿，尤其是對於「廷杖」。他在萬忠貞傳後，記明代廷杖的情形說：

「故事：凡杖者以繩縛兩腕，囚置達午門外，每入一門，門扇隨開。至杖所。列校百人，衣襜衣，執木棍，林立。司禮監宣駕拈訖，坐午門西階下左，錦衣衛使坐右，其下排而趨走者數十人。須臾，縛囚定，左右厲聲喝；喝闌棍，則一人持棍出，圍於股上；喝打，則行杖，杖之三；喝令着實行，或伺上不測，則曰用心打，則囚無生理矣。五杖易一人，喝如前。每喝，環立者羣和之，或摩篋地，聞者股栗。凡杖，以布承囚，四人舁之，杖畢，舉布擲諸地，幾死者十恆八九。司禮監、錦衣衛使既分坐左右，列校行杖之輕重，必察二人之語言，辯其顏色，而黠者則又視其足；足如箕張，囚猶可生，靴尖一斂，則囚無生理矣。而諸惡少之習行杖者，縛草爲人二，一置碑於中，一紙裹其外，俱以衣覆之；杖置碑者，視之若輕，徐解而觀，則碑卻裂；杖紙裹者，視之極重，面紙無傷；能如是則

入選。成化間猶容厚棉重毡，正德時逆瑾用事，則盡褫衣。至於御史檢項，祭酒
檢項，尙書加項，此其刑之輕而辱之小者矣」。

於是作者慨嘆地說，「君子論明事至此，未嘗不歎其二百七十餘年之享國爲禍幸也
」。又說，「夫自設廷杖以來，數百年間，祇張驕主以拂諫臣之威，而予小人以鞭辱君
子之具。賢士大夫就危殆、受污辱者累累。間有杖一小人者乎？無有也。至於宋流，好
名沽直之人，遂以廷杖爲榮，而大書名紙以相誇耀，未幾回面易心，頓喪其守（原注：
楊光先投刺於人，書廷杖生榮，後失節；惠世揚以廷杖得名，後降賊），夫亦素未有以
養其廉恥，故一折而無所底也。唐開元間，刺史楊潛坐賊當死，上命杖之，丞相裴耀卿
謂「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隸，不當及於士夫」，上
從之。宋太宗以事怒周翰，將杖之，翰自言，「臣負天下才名，杖之不雅」，遂釋之。噫
乎，此唐宋之君，所以享國獨永，雖或中原倣擾，神州隳沈，而一跌復興，往往能延已
絕之緒於數十百年。若明則祚短亡速，亂臣賊子，接踵於世，甚至爾將然之灰，覆既破

之態，即求備安而亦不可得，豈非士無與處，國無卒斬之明效大驗也哉！」

作者認爲要使士大夫知廉恥，尙氣節，就不應該羞辱他們。殊不知明朝從所謂「太祖高皇帝」以來，對於士大夫是用着一貫的奴化政策的，羞辱士大夫，正是奴化政策的實施方法之一。明太祖曾發明過許多新的殺人方法，例如剝皮程草之類，至今倭寇對待其衣鉢。殺戮之後，繼以奴辱，廷杖之制，由是釐定。於是臣下都低眉順眼，隸膝奴顏，皇帝則掀髯笑曰：「莫予毒也已」。建文仁慈而庸懦，不能承其衣鉢，燕王樂得篡奪，又來一次大殺戮，所謂「瓜蔓抄」者，至今講歷史的還談虎色變。殺戮之後，則又繼之以奴辱。傳至烈帝，國祚已危如累卵，然而奴視臣下之風猶不稍變，享爾十七年，易相凡五十餘人，甚或朝受廷杖，晚復相位，真不知成何體統。烈帝嘗對他的臣下說：「朕非亡國之君，君等皆亡國之臣」，作者則於黃相國（道周）傳贊中駁之曰：「臣皆亡國，或亦不棄然乎？」大抵專制帝王，當權位尚未穩固時，則以殺戮樹威；權位穩固了，對臣下便一味用奴辱手段，務使廉恥喪盡，氣節掃地而後已；等到國勢垂危，權位動搖之

際，即日棄途窮，倒行逆施，殺戮奴辱，無所不用其極，而所謂士君子者危矣。在這裏，有一點值得注意的：在明朝初年，殺戮手段殘酷，殺戮方法新奇妙，但只是亂殺一陣，燕王的「瓜蔓抄」雖然株連得很多，但也只限於所部罪官的親屬戚友，並不會特定制，專和一般頭腦清醒或有正義感的賢士大夫為難；其後閹宦弄權，爪牙密布，提騎四出，於是稍有正義感的士大夫，卻岌岌不可終日了。然而當時民氣很盛，往往一人被逮，民衆羣起抗爭，最激烈的是天啓間徐州平民顏佩章等整殺校尉一事，見本書周忠介傳，略云：

丁公諱順昌，字景文，號夢洲，吳縣人。性剛直，疾惡如仇。已而與馬公起元俱被逮。繼嗣至吳，舉家號慟，公笑止之。因服出門。士民素德公，爭為公呼冤，遮道撫毛一盡語責之。比贖詔，衆喧不復聞，提騎手執鎗抵之地，厲聲曰：「魏公命，誰捨者！」衆忿怒曰：「然則偽旨也」。當是時，天大雨，萬慶齊鄉，棍挺瓦石雜上，蓬聲蔽天，怨氣恣湧，晝如晦，立斃官族數人，餘皆東西鼠竄。

，升屋登木，或墮廟中，皆戰栗乞命。……一覽大勢流行，不能出一語；諸司面如土，足不能舉步。次日一覽飛章告變，將屠其民，而顏佩章、楊念如、沈揚、馬麟、周文元五人者，前自承曰：「殺校尉獨吾勳爲之，他皆無與，周史部賢者，獨殺五人可也。」捷臂，髮上指，競取鎗鎗自擊就獄。當此之時，五人之名震天下；而犄勢稍殺，縱騎不復出來。……周公既遠，善人互戒不用天啓制錢，天下從而和之，京師馳逐各省，卒莫能奪，蓋廢格天啓制錢無算也。吁，可畏哉！

這一段描寫民衆激於正義而引起暴動，讀之處處有生氣，我覺得寫來比張溥的「五人墓碑記」更好。在政治腐敗，殺戮橫行的時代，這種民氣很可寶貴；明代自天啓以後，還得苟延殘喘，未始不是靠這種可貴的民氣來支撐的。其後黨爭愈烈，誅戮愈慘，民氣反似乎消沈起來，其實不是消沈，而是一種大事變將要來臨以前的騷動的沈默。正如魯迅所說的，「我們聽到呻吟，歎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了酷烈的沈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麼毒蛇似的在屍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應該留心了；

還在預告「真的憤怒」將要到來」。真的，後來「真的憤怒」終於到來了，那就是流寇，盜匪！

以上算是「奧外」所給予我的一點啓示。此外有許多精闢的論點，不妨略舉一二。如檢東林黨云：

「查自東林之名立，天下遂標榜爲名高，於是羣社紛起，而以復社爲東林宗子，咸以其社屬焉，若應社、幾社、聞社、澄社、儼書社、甬社、則社、大社、應社、登發社、羽朋社、匡社、駁齋社，統合於復社；而統以東村爲標志。方東林之盛也，莫不砥礪砥礪，扶正學，斥異端；以剛介斷烈爲重，以禮儀廉恥爲貴。而及其雜也，或腐糞灶下，而託名郊講；或掩足裏津，而寄籍鹽墳；或斥逐宦，鄉里不容，而竊吹草堂以洗垢污；或鄉賢名宦，物議滿騰，而謬依泰正以希交相豆。逮其變也，羣背棄矣，造言誘傷，鉤黨成面門戶判，于是有齊黨、楚黨、浙黨、蠅黨、宣黨、秦黨、趙黨、鄭黨、孫黨、東林黨之目。因而作百官圖，

作前鋒後勁榜圖。因而有天鑿錄、同志錄、雷平錄、蠅蚋錄、蠟蜂錄、點將錄、蠶蠶錄，而又有緝點將、緝蠅蚋，並七錄而盡歸東林。于是薰箱並器，雅鄭同聲，而清流亦濁矣。阮大鍼名在東林，周之變注名復社，大鍼豎刃以殺東林，之變反戈以攻復社；其他或開門揖寇，或勸進賊廷，或接名受職，或暮楚朝秦，論其人品，皆死有餘辜，誅之不足者，皆東林之孽也。

又如依附馬（士英）阮（大鍼）的楊文聰，金陵陷後，在浦城發清兵所執，不屈死，因此一死，後人往往加以曲諒，然本書則不爲楊立傳，僅於孫副使（臨）傳中略敘其行事曰：

「文聰字韻友，貴陽人，馬士英妹夫也。崇禎時，以江寧知縣勦奪官，賣士英力，歷遷至巡撫。文聰譎盛氣，善書畫，頗推獎名士，士亦以此附之。公（按指孫臨）欲得當報國，願無尺寸資，會文聰募兵龍泉山中，素善公，以書招，遂入其軍，因上書唐王，言開（按指仙霞關）外情形甚悉，特授副使，監文聰軍。」

。丙戌七月，江東破，大兵（按指清兵）乘勝取閩，文聰聞風先入閩，公亦隨之行。文聰姬妾多，異肩輿者百數十人，日行十數里，至清城界，兵追及之，問公爲誰，公抗言曰：「我監軍副使孫某」也，遂與文聰同執，文聰不屈，死之」。

從而加以驗斷云：

「錢澄之謂文聰志在聲色貨財，因時竊節餼，擁重貨，異妾妾以自隨，其募兵，自衛耳；而因以倡義歸於閩，則公爲之也。然則文聰歸者之善，轉因公而成也，亦何幸乎！」

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本書體裁的謹嚴，論斷的正確；又因爲究竟不是什麼正史，所以作者並不擺出十足的史官架子，使我們從這中間看出了作者的一片愛護民族的熱心來。「史外傳心」的目的，作者是達到了。

三十年三月，一個風雨晦暝之夜。

讀「煇書」

我是喜歡翻翻舊書的，尤其喜歡讀章太炎的文章，因為他言之有物，而文筆簡練，起迄自在，不像一般寫古文的，搭起了空架子，起承轉合，而內容卻空空如也。但在桂林，想買或者借一部「章氏叢書」是沒有的；最近在圖書館借到一本「煇書」，慰情聊勝於無，一周間竟讀上了十多遍。

「煇書」刻於共和二千七百四十五年（那時候章氏不奉清朝正朔，所以用共和紀年；共和者指周召共和而言），後來收入「章氏叢書」，改稱「檢論」。這是一部學術名著，同時也是為宣傳革命而作的。如「原人」、「序種姓」、「哀養書」、「哀清史」、「解業辨」諸符，或者發揮他的養義的種族革命思想，或者指斥滿清政府的奴役漢人，窒息學術思想；只是文句太艱深，用字又古僻，在宣傳上我想不會發生大作用的。全書除「前錄」兩篇，凡六十三篇。如果要把我的「讀後感」都寫出來的話，可以寫成數萬言；可

以找出他的學術思想的一真的系統，而加以評議（例如他堅持經古文派的立場，黜廢森嚴，而流弊所及，則爲頑固，爲褊狹）。但我不想這樣寫，這裏僅就他批評曾國藩、龔鵬、毛奇齡的話來說談。

他批評曾國藩說，「曾國藩者，譽之則爲聖相，毀之則爲元凶。要其天資，頭功名幸人也。始在翰林，醜舉聲律書法，以敵諸弟。稍游諸公名聲間，而慕蔡春，沾沾以文辭蔽道真。金陵之舉，功成於臆試，亦有羣率張其羽翮，非深根算極，舉而請之爲舉業也。所志不過封微侯，圖紫光。既振旅，未嘗建言持國家安危。黜腐於清室之宗讓者邪？方諸唐世，王鐸、鄭畋之倫。……死三十年，其孫廣鈞曰：『吾祖民賊』。悲夫，誰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雜志）

他批評龔鵬、毛奇齡說：「龔鵬益……仕明及清，再至尚書。龔益爲人，徇名而死權利。江南故爲人所幸，已以貴官擅文學，爲其渠率，自喜也。鄭成功嘗從受學，既而舉舟入南京，皖南諸府皆反正，龔益則和社甫秋吳詩爲凱歌，且官新天子中興，已

當席捲待罪；當是時，稍留都光復在倥偬間，方假臥待歸命，而成功敗。後二年，吳三桂弒末帝於雲南，譚益復和秋爽時以告哀，凡前後所和幾百章，編次爲『投筆集』。其悲中夏之沈淪與犬羊之傲極，未嘗不有餘哀也。……初，明之亡，有舍肥體鼎學、吳偉業，皆以降臣善歌詩，時見憤激，而偉業辭特深隱，其言近賦。世多謂誰益所賦，特以文墨自刻飾，非其本懷。以人情恩宗國言，降臣陳名夏，至大學士，猶拊頂言不當去髮，以此知誰益不盡隨僞矣。是時蔚山毛奇齡，嘗南都傾覆，以布衣參西陲軍事，竄敗，走山寺爲浮屠。永曆六年，人或梅之清，率亡命爲王士方，屢側山谷間，卒得脫；乃徬潯齊楚梁宋鄭衛，作『讀哀江南賦』萬餘言，滿馬州，寓故懷慶王邸，作白雲樵歌，事僂尋聞於順天德家，欲陷之，亡去，匿土室。康熙時禁銷解，奇齡嘗以何科得檢討；吳世瑤死，爲『平漢頌』以獻。君子信其少壯苦節，有古烈士風，而晚節不終，矧於旌義。全祖望藉學術以阿諛之，其言特有爲而發也」。(別錄甲)

章氏批評明末清初的人物，有一個原則，就是：倘不得已而做了滿清的官，只要他

猶存成仁之思，對新朝無所獻議，可以曲加原諒。因此，他對於錢謙益有怨辭，對於毛奇齡的獄題請宥，晚節不修，深致惋惜；而會國藩則雖然在「振旅」之後，「求晉建首持國家安危」，但因為他助吳旋攻同種，不能不給他加上「民賊」的惡鑑。

章氏的對子毛奇齡，曾國藩的體責，我無異辭。但他的寬恕錢謙益，我以為屢成問題。雖然，錢謙益在許多降臣中間，還是一個未失其羞惡之心的。記得某野史載錢謙益晚年，鞅柳如是遊某地，見一清流，謙益欲解襪濯足，而躊躇不前，柳如是笑着說，「這不是秦淮水，你大胆下去好了」，謙益為之臉紅。這就是未失其羞惡之心的表見。章太炎在「哀清史」管中說，「錢謙益與馮銓，其戒心一也，一思明，一忘明，則惡名歸於思明者」。這似乎確是後人太苛責了錢謙益。但我以為順逆之辨，只有知識分子最為清楚，所以知識分子當民族國家危亡的時候，在崇尚氣節方面負着以身作則的責任，而後人對於知識分子的責備，也比較嚴苛。錢謙益在明末，是清流的領導，黨人的渠率，明亡後，他縱不能以一死報國，也應該殲身殿穴，與王而農、李二曲之流，同以隱逸終

身。不幸他「仕明及清，再至尙書」；即使他緬懷故國，對新朝無所獻曝，也沒有可以曲加原諒之處。

太炎先生寫「題書」在清朝末年，他之所以曲諒錢謙益，無非借此來說動當時漢人之仕中朝、鎮外藩者，教他們毋忘故國，迷途知返而已。倘在今天，我想他不是這樣寫的。可憐太炎先生死了，如果他還在着，他對於他們的門弟子周作人之流，恐不僅喊「小子鳴鼓而攻之」，他必有高文宏論，來圍困春秋思王父之義，而呵斥他的不肖弟子的。

關於陶淵明

一 替陶淵明說話

讀了曹聚仁先生的「從陶潛到蔡登」，使我想起陶淵明。我覺得因周作人而牽連到陶淵明，未免有點厚誣古人。在兩年前我曾寫過一篇短文，題曰「雜談三則」：一、檢陶，檢討陶淵明也；二、貶庾，貶責庾信也；三、呵周，呵斥周作人也。在「檢陶」裏面，我的結論是：「像陶淵明那樣的詩人，我們生在千載之下而又值社會噴變的今日，要學他是不可能的。因此我覺得，如果看到現在某一作家的幾篇小品文，因為裏面不談國家大事，文章也做得平淡而悠永，但表態他，說他也很像陶淵明，那未免厚誣古人了」。但我得聲明，這幾句話並非對曹先生而發，我那時候並不知道曹先生曾說過「周作人從孔融到陶潛的路」這句話也。

不過我對於陶淵明的看法，多少和曹先生有點不同。這裏我又要提到魯迅先生。魯

迅先生說：「陶潛之在晉末，是和孔融於漢末與嵇康於魏末略同，又是將近易代的時候。但他沒有什麼慷慨激昂的表示，於是便博得『田園詩人』的名稱。但陶集裏有『過酒一蒼，是說當時的政治的。……由此可知陶潛總不能超於處世，而且，於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然而曹先生卻不會用別一種看法來研究陶淵明，所以他六年來說周作人要從孔融走向陶潛的路，而現在又說周作人「從陶潛轉到蔡邕的路上去」了。其實周作人假使真走向「陶潛的路」，他是不会再轉到「蔡邕的路上去」的。所以者何？因為真正的陶淵明，不是曹先生所說的陶淵明也。

現在讓我們用別一種看法來研究陶淵明罷。

朱晦庵曾說過，「淵明詩人皆說平淡，余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來不覺耳」。顧定盦也說，「莫信詩人（指淵明）竟平淡，一分梁父二分曠」。我們且把「陶集」翻開來看，除了「詠荊軻」一篇已有人說他「露出發放本相」者外，其他如贈「羊長史」詩

，是在目觀北方失地收復（太尉劉裕滅後秦，時當公元四一七年）時候寫的，詩曰：

「燕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類古人書。聖賢曾餘跡，事畢在中都，豈忘游心目，則河不可踰。九域甫已一，遊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

荷不獲俱……」。

你看他多麼興奮！又如「感士不遇賦」序云：

「自真風告逝，大偽斯興。閭閻懷靡退之節，市朝懸易進之心。懷真志道之士，或潛玉於當年，喪已俯操之人，或沒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悲。悲夫，穹形百年，而瞬息已矣，立行之難，而一境其實：此吾人所以染棘慷慨，屢伸而不能已也」。

又如「楚詩」云：

「後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感此懷悲悽，終曉不能歸」。

又如「讀山海經」云：

「精術銜微木，將以遠雷海。滔天舞于咸，猛志固常在。」

又如「榮木」第四首云：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草，策我名驥，千里

雖遙，孰敢不至！」

從這些詩文裏，都可以把陶明看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朱晦庵說，「隱者都是帶性負氣之人爲之，陶徒有爲而不得者也」。這句話說得有點對。

陶淵明係過鎮軍參軍，那位鎮軍將軍，有說是劉裕，有說是劉牢之，且不去管他，總之，後來陶明的歸隱，是看不過軍閥跋扈，自己又沒有什麼能力，不得已而出此的。正如焦循所說的，「自知不能益人家國，託迹於山溪林莽，以匿其拙」，「宜於朝則朝，宜於野則野」。在那一個時代，像陶明一類人物，也有他的立足之點，我們正不必在千載之下多所非議。

是的，「我們歡喜陶潛之爲人，多少由於愛好他的詩畫而來」。然而陶淵明的詩畫

之所以千古不朽，到現在還爲我們所愛好者，正因爲他的高尚的人格與和平的性情，充分表見在他的詩篇裏之故。王靜庵說：

「天才者，或數十年而一出，或數百年而一出，而又濟之以學問，助之以偉性，始能產生真正之大文學。此屈子、淵明……等所以曠世而不一遇也。」

「三代以下之詩人，無過於屈子、淵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無文學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無高尚偉大之人格，而有高尚偉大之文學者，殆未之有心。」

以此之故，曹先生說「假使淝水之戰，晉軍敗績，東南半壁，畢竟不保，陶潛一流人是否依然隱逸下去，不做異族的臣僕，我實在不敢替他們寫包票」。我却敢替陶潛寫包票的。我憑着什麼敢寫包票呢？除了上述種種，還有一個大保證，那就是陶淵明在劉宋篡晉以後，但用甲子紀年，不寫劉宋年號這一樁事。你想，他看不起孫人孤兒姪婦的新朝，連新朝的年號都表示不承認，他會去做「異族的臣僕」嗎？

真到這裏，我又想起一樁事，就是有人以長沮桀溺比陶淵明，例如章太炎說：

靖節自知飢寒相擾，然不肯墜故轍以求免。……靖節，沮溺之倫也。子楚遠之事佛，周續之之說禮，殆有所不滿焉。

而陶淵明亦嘗以沮溺自況，如說「遙遙沮溺心，千載乃相關」。不幸長沮桀溺一流人，因為和孔子立異之故，一向就被所謂「儒者」所非議。然而我們如果看清了長沮桀溺所處的是什麼時代，也許會得出一個和舊說不同的結論來。那時候「君子」和「小人」兩大身份階級相對立，自屬於「君子」階級的「孔夫子」，蓬衣淺帶，矯言僞行，遊列國，干諸侯，在以勞動為生的「小人」們看來，是可恥的，所以長沮桀溺之流，有機會就要譏諷他一下。我們如果不站在統治者方面打官話，則沮溺之倫也可厚非！

話說得遠了，趕快帶住罷。總括說來，我以為我們向論古人，千萬不可以一時的好惡來評短長。如周作人之流，即使在六年前，也不能和陶淵明相比的。就是拿現在的周

作人來比蔡區，我也覺得對不起中郎。董卓誠然是一個跋扈軍閥，然而他不是異族，中郎「以身殉卓」，不過是「遺玷千古」。玷者白圭之玷也。白圭之玷，尙可磨也。若爲異族臣僕，而沾沾尙尙以倪元鎮自况如周作人者，斯乃大辱，終身莫洗。

漢奸周作人之流且不論。但目前我們也不需要陶淵明一流的人物，這一點我和曹先生意見相同。我在那篇「阿周」的短文裏曾說過：「處於現在的中國的知識分子，除了做保衛民族的鬥士和出賣民族的漢奸，還有來路可鑽，還有第三條路可走嗎？」然而事實上有許多知識分子尤其自命爲京派教授的，卻在到處找夾縫，找第三條路，他們沒有找到，我不知道，不過在他們屢次表示瞧不起「抗戰文藝」這一點上，一副尷尬的嘴臉，卻有點令人討厭。我以爲與其有這種人，毋寧有幾個陶潛，因爲他至少對於世事還有點熱情，不但「猛志固常在」，而且有時「終夜不能靜」的。因爲他只是「託迹於山溪林莽」，不是跪在半空中，扇起導師的大旗，掛着知識分子的標幟，來向青年們說教。

(附) 曹聚仁：從陶潛到蔡邕

沈從文先生近在國文月刊(三期)談習作，叫青年們從周作人魯迅作品學習抒情；其中說到周作人的人生態度，「似因年齡堆積，體力衰弱，很自然轉而成爲消沉，易與隱逸相近，精神方面的衰老，對世事不免具浮沉自如感」。又引了我的意見，說周作人是「由孔融到陶潛」。我說周作人從孔融走向陶潛的路，那是六年前，當周某發表五十自壽時時說的；可惜沈先生不曾看見我前年寫給周某的信。我希望他不要從陶潛轉到蔡邕的路上去，可是他畢竟走上蔡邕的路，我們做朋友的，又有什麼話說呢！

切切實實的說，我是反對所謂「隱逸」的人生態度的；一個知識分子，當民族國家在作生死存亡的搏鬥時，應當奉獻自己的一切，聽政府作有效率的使用；在最緊急時，準備徵集令下，也當投筆屑槍去。所謂「隱逸」，真是答謝份子的巧妙遁詞；說得老實一點，便是「臨陣脫逃」，隱逸之士，便是「逃兵」。中年以上的知識分子，託詞「消極」「隱逸」來躲避對社會國家應負的責任；青年知識分子，借學校來逃避兵役，這都

是可恥的行爲。

不過這些話，向已經出賣了靈魂的漢奸文士來說，原是多餘的，我現在只想和沈先生談談從陶潛走到蔡元培上去的必然性。我們歡喜陶潛之爲人，多少由於愛好他的詩篇而來，其實他的處世態度，並不足爲法的；我們是生存在社會網之中，社會問題便是我們自己的問題，我們怎能不管不問呢？掛冠而去，不爲五斗米折腰，都是讀書人使性子的辦法，有什麼可取？社會上有一二個陶潛，或者有人覺得有趣，或者可以出賣清高；若有了十萬個陶潛，或百萬個陶潛，那就不知要糟到什麼程度，亂到什麼程度。焦循說得好：「人不可隱，不能隱，亦無所爲隱。有周公孔子之學而不仕，乃可以隱稱；然有周公孔子之學，則必不隱。許由、巢父、沮溺之流，自負其孤子之性，自知不能益人家國，託迹於山溪林莽以匿其拙，故吟詠風月則有餘，立異矯世，苦節獨行則有餘，出面操天下之柄則不足。……是故齋而食，隱而飲，分也，出則爲殷浩房瑀，貽笑天下，宜於朝則朝，宜於野則野，聖人之蘊，所以待用也，無可用之具而自託於隱，悖也。」

這辭，不僅罵盡了知囊中那一流的假隱士，也罵盡了陶潛一流的眞隱士；吟詠風月則有餘，撫天下之柄則不足，卽是陶潛一流人的最好考證。

罷罷濁水之戰，晉軍敗績，東南半壁，畢竟不保，陶潛一流人，是否依然隱逸下去，不做眞族的臣僕呢？我實在不敢替他們擔保。你看南宋末年，國多忠烈之士，但出山與齊，後來食元代之祿的如許衡趙復，不在少數；漚漚入關，下首陽時夷齊且不去說他，卽如關孝林那樣的大志士，也不能替他自己脫外甥徐鉉學做魏清的開國元勳。民族興衰觀念如此薄弱，儒家的社會道德上，原有最根本的弱點保留着。所以再作人做漢奸，兩漢變成了秦皇，並非意識上的突變，再作人之心安理得，真正如蔡邕之心安理得，豈不覺得難爲情的。

愛惜再作人的，都垂望再作人愛惜他自己的羽毛；他自己已經出賣了靈魂，愛惜他的人，還希望它來原其心跡，不要太嚴苛地責備他；有的還用種種話替他維護，沈先生說他老了，不免具澤沉自如之感了，卽是一種維護。我們應該原其心跡，替他維護嗎？

不能。萬萬不能。王夫之論蔡邕的出處，有一段話，我以爲不妨提出來讀一讀，他說：

「史記董卓之辟蔡邕，邕辭疾不就，卓怒曰：『我能族人。』邕懼而應命。此殆借邕之才，爲之辭以文其過，非果然也。卓之始執國柄，亟於名，而借賢者以動天下，蓋汲汲焉。……力任桓靈官豎之政，輟譽以動天下，蔡邕首被徵，豈其禮辭不就而違欲族之哉！故以知卓之未必有言也。且使卓而嘗此矣，亦其粗獷不擇，一時突發之詞，而亦何足懼哉。申屠綰不至，袁紹橫刀掛出，盧植力阻弘農之廢，鄭業阻用兵之議，而皆全身以去矣。邕以病辭，未至如數子之決裂。而何爲其族與？邕之始爲議郎，程璜之舉，陽球之辭，可以指顧殺人，而邕不懼，累及叔質，幾同駢首以死而不懼，何其壯也。至是而段熲，亡命江海者十二年，……官豎之怨積，而快志於一朝，兇鋒之危厥深，而圖安於晚歲，非權勳也。較以卓能嫉官豎之惡，而庶幾於知己也。於是而其氣酸矣，不以身殉卓，照玷千古，氣一倏解即於死亡，後雖與植其當年之壯氣，

這番話，也可以用來作對周作人的譴議。無論誰著周作人作怎樣無稽的話，總不能說出周作人必不能離開北平這國界的理由，更無從說出他非出賣靈魂不可的理由。說來說去，還是「己私未忘」而懼辱之情，終於衰者也！周作人也竟做了漢奸，知識分子的操守，真不容易說了呢！

有人說，現在知識分子專仇作假，不獨周作人一人，任何竊奇於周作人而必嚴加責備之說來，還是顧亭林那句老話：人人可出，而他必不可出。周作人乃是五四運動以來的青年導師，文化界的巨擘，連敵方的文化大將以為他將消盡介守，不肯出山的，而今竟出山（應該說出苦茶室）事敵，我們怎可以不加嚴厲批評呢！

我鄭重地說，周作人是「茶室」，不是「陶潛」；陶法其在，陶潛行之與刑！

二 從「歸去來辭」說起

關於陶淵明「歸去來辭」中的「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之得時，成

吾生之行休」，我同章蔭年先生生的看法（註）。據明植以家貧親老，嘗負薪採薪，偶作鎮軍志軍。他補彭澤令，在晉安帝義熙元年八月，就在那年冬天爲了不肯向鄉里小兒折腰而賦「已去來」的。淵明一生除「州祭酒」不算外，至少做過七八年官，做的又都是盜賊之類，那時候荊州揚州兩系軍閥，連年混戰，荊州系軍閥桓玄失敗了，劉裕正一手兼握軍政大權。那些結廬文人，奔走依附於軍閥之下，一種患得患失的隨從，我們說他坐於千鈞之下，還是想像得出。陶淵明自然看不快這些，所以他做官的時候，常常表示他的「飢凍離切，寤已交病」的苦痛。他初作縣軍臺軍時便寫出「晨登飯蔬鳥，臨水愧鯉魚」的詩句；在桓玄那裏做官「赴假還江陵」時，又寫出「挽冠旋覆壘，不爲赴幕興」；發其衡茅下，庶以養自名」的詩句；在做建威參軍奉命使都時，又寫出「終懷在錄虎，諒哉宜落楫」的詩句。等到他丟掉彭澤令時，他已決意不再做官了。爲什麼呢？他說：「質性自然，非矯厲所得。飢凍雖切，違已交病。嘗從人事，嘗以康良楫。於是怡然得解，深悼平生之志」。他當然早已看出了劉裕的野心，知晉祚之將移，眼看將乘

總有一批脫離事類主的貧人。他自己便決定做一個「不爲好爵祿，養真衡茅下」的平民，把自己的高風亮節，奉獻給人類社會。他寫的「摸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漢惠若曰，「讓你們那些趨炎附勢的去當時罷，我是不幹了」！

我曾經一般箋注古人詩文集的，常常喜歡牽強附會，說某詩是「刺某某也」，關於陶淵明的詩文從沒有人這樣猜測過。其實陶集裏的諷刺詩文，仔細推考起來，倒也不少，最顯著的是義熙七年所作「與殷晉安別」一首（那時候劉裕的逆跡更昭著了，殷景仁受到褫爵，移家東下），現在全鈔如下：

「遊好非久長，一遇盡殷勤。信宿酬清話，益復知爲親。去歲蔡南里，移作少時鄰。負杖肆遊從，淹留忘宵晨。藉獻自殊勢，亦知當理分。未嘗事已及，與言在茲春。飄飄西來風，悠悠東去雲。山川千里外，言笑難爲因。良才不豫世，江湖多賤貧。脫有靈通便，念來存故人」。

統括詩中意思，便是說，「我移居南里，和你備了短時間的鄰居（注意！鄰居，非

朋友，更非同志也」；朝夕過從，非常高興，然而語默之間，我就覺得我們旨趣不同，遲早要分離的，但想不到這樣快。像你這樣的良才，當然不甘做隱士，宜乎江湖之上只剩些貧賤之士了。將崇尙有經過之便，希望你來與我老朋友」！此外如題刺周鼎的，有「示周鼎之祖金甌紫壤三郎」詩；而「述酒」一節，對於當時的朝政更有極辛辣而又極洗滌的諷刺。誰說陶淵明是田園詩人，不關心時政；誰說陶朝溫柔敦厚，不嫉害人物，那就是不諳得陶淵明。

我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年來對於陶期愈加愛好，這當然是「與抗戰無關」的。但對於另一位古人，近幾年來愈加厭惡，那就是「不爲貧言數論」的郭林宗。我愛陶淵明的「真」，就愈加厭惡郭林宗的「偽」。說起來話長，就此帶住罷。

（註）按蕭今度先生在「從陶潛說到秦惠」一文中說：「陶潛的『猛志固常在』等名句，魯迅和朱雲彬兩先生都曾引過，他不用劉宗年註，把劉宗年作爲秦，『秦』不與同中國，就是『歸去來辭』上的『未敢欣以荷秦』，秦指秦朝而論，漢指漢朝。」

之得時，成吾生之行休」？如恐不是早年所寫，即那般國家將亡，首先爲自己打算，賈官鬻爵，結黨營私的妖孽們，就是後來補寫，藉以罵那般依附結納，隳頹事新朝的新貴們的」。

三 陶淵明的「述酒」篇

因集中有「述酒」一篇，最爲難解，今將原詩錄後：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豈未黃，濕風久已分。素隴曠修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感嘉粟，西靈爲我馴。諸梁蹇節旅，華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改名猶不勤。下生善節敬，安樂不爲君。平王去舊京，映中前遺鷲。健陵布云育，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閉居隱世紛。城戢西墜內，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

詩的題目是「述酒」，並在題下加注云，「儂欲造，杜康酒色之」，而述篇沒有一

句講到酒，實在令人無從索解。南宋湯東潤（漢）撰「清節詩注」四卷，以「述酒」爲哀晉武帝而作。其自序云：

「胸公詩語深而妙，測之愈遠，不可漫觀也。不事異代之節，與子居五世相傳之義同；既不爲狙擊展附之舉，又時無演祖者，可託以行其志，故每寄情於首陽易水之間，又以割軀繼二統三良而發歎，所謂撫已有深懷，屢運瓊紙給，讀之亦可以深悉其志也。平生危行避言，至「述酒」之作，始直吐忠憤，然猶亂以異辭，千載之下，讀者不省爲何語，是此篇深所注意者，迄不得白於後。尤可以與人增歎而翼歎也。余偶窺見其指，因加箋釋，以表慕其心事，及他篇有可發明者，亦併著之。文字不多，乃令精寫模傳，與好古通微之士共商賂焉。」

湯注本流傳極少，清人吳奕琳（拜經樓主）取宋本重加校印，而加以跋語云：「南宋都陽湯文清公注陶靖節詩四卷，其貴與文獻通考所稱之。所謂述酒詩乃哀晉魏而作，其微旨雖差轉于越子養，至文清反覆研討，而益暢其說，真可謂彰澤異代之知己矣。」

按劉裕于義熙十四年多，命王韶之殺督安帝，立司馬德文，是爲晉恭帝。兩年改元元熙。元熙二年夏，劉裕廢晉恭帝爲零陵王，自稱受禪，改國號爲宋，年號永初。永初二年，劉裕以毒酒一瓶投張華，命華殺零陵王，華於道中自飲而死。是年九月，劉裕復命零陵王妃兄褚斌之等往視王妃，疑妃外出，兵人墮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兵人以被掩殺之。淵明此篇爲痛恨劉裕行篡竊及哀悼零陵王被弑而作。既以「述酒」爲題，暗示詩意，又故意在題下加注，以亂人耳目。全篇又都是隱語，遂使讀者不能明瞭。獨韓子蒼以詩中有「山陽歸下國」之句，係借曹魏廢獻帝爲山陽公故事影射劉宋廢晉恭帝爲零陵王，推測此詩是義熙以後有所感而作，後經馮東潤反覆研討，黃文煥、陶澐等積有疑釋，詩意乃漸漸明顯。歸納起來可以作爲如是解：自「重陸黑雨陸」至「重華回盤墳」，是說晉室南渡之初，還有一點朝氣（重陸黑雨陸，鳴鳥聲相聞。按司馬氏爲重陸之後），其後偏安江左，國雖未亡，氣象漸就蕭條（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至景駿面王氣已盡（素調晶條落，南嶽無餘聲。按南嶽指零陵王，以零陵在衡湘間也）。

於是劉宋建國，零陵被執（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玆。按上句言劉裕稱帝，裕曾封兼章郡公，高門同奉門，天子之門也。下句言晉恭帝讓國後終於被執，兼名重華，借以比讓國的晉恭帝也）。「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乃反復詠嘆，說他自己眼看世界大變，只是流淚嘆息，夜裏常常失眠。「神州獻嘉粟，西靈爲我調」，西靈當作四靈，是說劉裕借這種祥瑞（例如義熙十四年羣縣人獻嘉禾），以爲受禪根據。又恭帝禪位原有「四靈效瑞」之語（一說，此用穆天子傳西王母諸國獻禾獻芻諸事，謂西晉全盛時，五胡未亂，四夷賓服，今不可見矣。亦通）。「諸梁董師旅，華騎與其身」，是借春秋時楚國葉公誅白公事以寄慨，意謂白公欲篡弒，賴葉公討平之，現在還有葉公其人嗎（按春秋時楚白公辛勝作亂，葉公沈諸梁討之，白公奔山自縊死，見左傳襄公十六年。一說白公亂楚，而沈諸梁督師復之。邵克晉初有王敦、蘇峻之亂，卽有陶侃、庾亮之功，曷猶有人也，今亦不可見矣。亦通）。「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動」，是以漢末山陽公暉襲魏王。鄒山稱禪魏，尙得善終也。「卜生善斯故，安樂不爲君」，類句較費解，諸家無

適宜避釋，或謂此用莊子牧羊乎之語，謂天子面不自保其身，即求爲人，或亦何可釋，此說足備參攷。一平王去舊京，至「三豎頗奇文」四句較釋之諸家亦無確證。晉（或謂魏卽鄭之鄉，成王是游於鄭鄉，卽今洛陽。意卽魏鄉之鄉，固有魏晉之思。晉五陵在洛陽，不敢明言五陵，故稱穆陵。三豎爲晉魏受禍時的魏鄉，見左思魏都賦序。劉劭受難時，亦託言諸穆陵。此以平王東遷定晉室南渡，謂晉自遷其在，而中原沒於鮮卑，劉劭平姚泓，移復晉五陵，置守衛，然國恥甫雪，而憂愁已甚也。可備參考）。一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則借王子晉乘鸞昇仙（見列仙傳），隱寓願生身世做勿生帝王家之痛（或謂王子隱「晉」字，河汾亦晉地，益言晉經已去也。可備參考）。一朱公綠九齒，聞是離世紛，蓋言避亂世而思隱居學道（或謂宋公隱「陶」字，蓋言晉運已去，自己只好隱居避世了）。一賊賊西嶺內，至「彭陽非尋倫」，承上文而言，意謂富貴不如長生，卽速辭思遠避之旨（西嶺一本作西嶺。或謂西嶺指零陵王所葬地，謂零陵侯息邱山，天容自固，豈可與尋常壽夭並論；但此說殊牽強）。

總括全篇主旨，大抵如此。我嘗推考魏晉以來，篡亂相尋，而淵明對於劉裕似乎特別痛恨，這中間一定別有原因。按劉裕於義熙六年滅南燕，十三年大舉兵滅後秦。牧覆長安，那時侯涼州諸國都懷懼危懼，他大可乘勢統一北方。當時淵明聞北方收復失地，喜不自勝，作詩贈羊長史，有「九載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河不徒俱」等語，那知劉裕蓄心篡奪，不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一聽劉裕守後方的他的心腹劉牢之死了，怕有人搶奪他的地盤，便匆遽地領兵南還，以致長安又被夏王赫連勃勃乘機取去，北方仍在異族宰制之下。這和門人利益高乎民族利益，對內重乎對外的跋扈軍閥，富乎民族思想，富乎正義感的陶淵明，對之如何不深惡痛絕？因此我以為淵明之痛恨劉裕，不僅因為他是晉朝的亂臣賊子，同時因為他專使北方長被異族佔領，只圖竊取帝號，權安江左，以小朝廷自娛。

陶淵明而忠憤慷慨的辭句隨處可見，固不僅「逸酒」一篇，亦不僅如陶對所說「蘇二疏明進退之節，蘇荆柯實報難之志」。所以真西山說他「雖其遺榮等，一得爽，真有

曠達之風，縱玩我醉，時亦適涼感寒，非無懷世事者。可笑近來有甚不放莊麗現實，
而又高標文藝家的聲價以自詡的人，當他喊出什麼「驚轟新而透痛」的時候，人常常借引
陶淵以證其說，例如說「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如何空靈，如何超脫現實，好像陶
淵原是「一位遺世離獨立」的仙子。其實他們倒著了解藝術，何嘗了解陶淵明？假如吳陶
達所云，「陶公胸次淋漓和平，而忠憤激烈，時發其詞，得無交戰之累乎」，也不能
說是了解陶淵明。實際上陶淵明當涉濤和平時，不妨「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當
忠憤激烈時，便要「流淚抱中丞，傾耳聽司晨」了。不但如此，當他情欲衝動時，還會
寫出「聞憤賦」來哩！這是很自然的。因為人是感情的動物，白天「悠然」，晚上「流
淚」，未免得說是「交戰之累」，這原詩寫一篇「聞憤賦」，也不見得是什麼「自盛自
誇」。革命家不會整天悲憤，理學家也不能危坐終日。反過來說，「悠然」一番，不見
得就會成高蹈遠舉的逸民隱士，「流淚」一番，什麼「願在履而當絲」，願在裳而為緇」，
也不會馬上變成「性博士」，凡事執其一端，紛紛議論，都不免要成為笑料的。

四 陶淵明之名字及身世

余僅爲開明書店編撰中學生叢書「陶淵明」，敘述淵明家世，取諸家所撰淵明傳記及年譜讀之，紙卷之屬，不一而足，約而言之，蓋有四端——

一、名字 淵明名字，晉人人殊：（一）名潛，字淵明，朱書及南史本傳主是說，遠註高實傳同。（二）名淵明，字元亮，梁昭明太子陶淵明傳主是說。（三）名潛，字元亮，晉書本傳主是說。（四）潛字淵明，前所行，淵明字元亮，後所述，蓋以自別於晉宋之間，吳仁傑南齊書元亮年譜引梁夢得說（按：宋自潛謂此說不見於現存梁夢得諸書中）。（五）名淵明，字元亮，以字名潛，吳公武郡齊讀齊志主是說。（六）名淵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潛，吳仁傑陶靖節先生年譜主是說。（七）義熙中名淵明，字元亮，元嘉中名潛，字淵明，明熊人霖主是說。（八）名淵明，字元亮，小名潛，梁啓超主是說。（九）名潛，字元亮，亦名淵明，古直陶靖節年譜引羅國瓌說。此外唐人避李淵諱，或改淵明爲深明，亦有改淵明爲東明者（李白詩云：商歌二夜楚東明）。朱自清曰：

「吳譜」按、指吳仁傑國朝節先生年譜。前集載孟府君傳及晉義熙三年蔡程氏妹文。皆
首名潤明，惟唐虞、蔡、指潤明太子所作傳。及晉書南史載世對桓道濟。實。則自歸曰
潤。因主元宋更名之說。按、顏詩（按、指蘇延之所作陶徵士諱）雖有晉徵士陶潤明
」，據義熙末徵著作佐郎。徵書晉。書故名。義熙末去永初僅二三年，時猶居潤明，則
入宋更名，當可信也」。按、宋氏之說，則潤明名字問題，猶易解決；但潤明生年，則又
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已。

（二）生年。宋書本傳云，潤明卒於元嘉四年（四二七），年六十三。依此追觀，
則潤明應生於晉安帝興寧三年（三六五）。然顏詠但云「元嘉四年卒，春秋若干」，並
無年六十三之說。蕭傳及晉書南史本傳，皆襲宋書，茫無實據。張頌據「辛丑游斜川詩
」有「開歲倏五十一」之句，謂「若以此詩爲正，則潤明生於壬子歲（三五二），得年七
十六」，然「辛丑」一本作「辛酉」，「開歲倏五十一」一本作「開歲倏五日」，自未能
據以爲說也。自後梁啓超，古直先後作潤明年譜，梁謂潤明得年五十六，古謂得年五十

二、軍皆以己益推辭，不可遷信。淵明生年，戰時存疑也。

(三) 魏軍參軍。淵明集有「始作鎮軍參軍經臨河傳」詩一首，不風罕見。原謂鎮軍參軍，即鎮軍將軍之參軍也。考東晉爲鎮軍將軍者，太元五年（三八〇）有郗愔（晉書武帝紀），王羲之（晉書本傳），十年（三八五）有王羲之（晉書本傳），元興三年（四〇〇）有劉裕。以年歲推算之則淵明曾任劉裕參軍；然後人以劉裕終孫晉祚，料淵明必不至屈節事權貴，遂有種種猜測：（一）宋葉夢得謂淵明實受劉裕逼迫，爲參軍非其本願（吳郡臨安五年下引）。（二）吳仁傑則謂此詩作于隆安三年（三九九），與劉裕作鎮軍將軍之年歲不合。（三）陳敬謨謂淵明爲劉裕參軍，因當時劉裕尙以蘇王統賊爲號，石勒不稱其爲鎮晉祚也。（四）陶澍則謂淵明爲鎮軍將軍在隆安三年（三九九），時劉牢之以擒王恭功，以「龍將軍」代王恭鎮京口，淵明由潁川至京口赴參軍任，此阿爲必稱之。據晉書職官志有左右前後將軍，而左右前後軍軍鎮稱軍，故「龍將軍」可省稱「鎮軍」。又晉書王恭傳顯是時都督以「北」爲號者皆不稱，故王恭稱「平北將軍」之說。

會上表辭謝；劉牢之繼奉而爲鎮北將軍，潤朗爲其僚佐，或有意諱言「鎮北」而稱「鎮軍」也。是年海寇孫恩猖獗，牢之奉命東征，潤朗飲酒詩有「在青會遠遊；直至東海隅」之句，又可知潤朗會隨牢之東征云。陶謝之說，梁啓超、古直皆極口讚頌，而朱自清獨持異議，謂（一）袁宋書武帝紀，元興三年（四〇〇）裕鎮石頭，明年屢請留番，三月從鐵丹徒地潤朗始作參軍而道經幽阿，蓋起丹徒也。細查臨海一語，則劉裕會開府丹徒矣。（二）劉裕墓石，在爲鎮軍將軍後十六年，潤朗非先知，何能預料十六年後事，縱會爲參軍，與大節無漸，正不必爲之諱飾也。（三）陸安三年劉牢之尚爲鎮北將軍，明年方以前將軍爲鎮北將軍。且左右前後四軍非即鎮衛軍，晉書職官志「五校」條下有云，「後省左軍右軍前軍後軍爲鎮衛軍」，蓋謂左右前後四軍併爲鎮衛軍，非云左右前後四軍即鎮衛軍也。（四）飲酒詩所稱之「東海隅」，按劉履「晉詩補注五」云，「東海即幽阿，其地在宋爲南東海郡」，然則與劉牢之東征事渺不相涉，陶謝可謂鑿鑿監附會之能事矣。以上引諸條之說，似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考其實，則釐補百出，

無一說足以成立者。何以故？（一）淵明集有乙巳歲三月爲遼威將軍使都統錢溪時一首，有「我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之句。乙巳爲元興四年。劉裕爲鎮軍將軍在元興三年（甲辰），是年劉敬宣以破桓歆功，遷遼威將軍江州刺史。如淵明于元興三年始作劉裕參軍，經曲阿赴丹徒，明年三月又在江州奉劉敬宣軍幕，而奉命使都，則淵明在元興三四年之間道經錢溪當匪止一次，何以詩云「吾不踐斯境，歲月好已積」也？（三）左右前後四軍非即鎮軍，而鎮軍亦無有稱「鎮軍」之例。鎮軍更不能簡稱「鎮軍」。晉書簡文帝紀云，「太元六年十一月，會稽人檀元之反，鎮軍參軍謝稱之討平之」。所謂鎮軍參軍即鎮軍將軍王羲之參軍，可知鎮軍參軍即鎮軍將軍參軍之簡稱，不容予以曲解。劉牢之未嘗爲鎮軍將軍，則淵明曾爲劉牢之參軍之說，不攻自破矣。（三）淵明詩題「始作鎮軍參軍」，所謂「始作」，無論作「始仕」解，或作「始就軍職」解，要之，淵明始於此時離薄經曲阿而至京口（假定鎮軍幕府在京口）就職也。淵明如爲劉裕參軍，則淵明在元興三年未就軍職以前應在萍陽故鄉矣。然

淵明集又有庚子歲五月從都還阻風於覲林詩二首，庚子爲隆安四年（四〇〇），可知淵明非於元興三年始離潯陽也。然則淵明作鎮軍參軍始於何年，爲何人之參軍，在未得新證據以前，一時殆無法解決矣。

四、赴假還江陵 淵明集有「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詩一首，亦爲歷來諸家所聚訟：（一）美夢得以荊州刺史自隆安三年（三九九）桓玄襲殺殷仲堪，卽代其任，直至元興元年（四〇二）方離江陵，淵明之赴假還江陵在隆安五年辛丑（四〇二），疑淵明嘗仕於桓玄。（二）王質栗里年譜據「庚子歲從都還」及「遊斜川」二詩，謂淵明留潯陽除年，嘗是予皆在鄉，至是往赴。（三）吳仁傑謂淵明以庚子歲作鎮軍參軍，乙巳歲去彭澤，不復仕，故還舊居詩云，「時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自庚子至乙巳，凡六年，既云家上京，又有從都還阻風詩，則是未嘗居江陵。使淵明果仕於玄，不應居京師，豈居江陵，不應以爲上京。（四）陶澍釋「赴假」爲「歸假」，謂「意必以事使江陵，路出潯陽，事畢，便道踏假歸省，其辭簡，猶曰赴假還自江陵云爾」。又謂「致

晉書，是年六月，孫恩寇丹陽，建園建康，中外戒嚴，時桓玄以荊州刺史鎮江陵，上表請入衛，會恩退，朝廷以詔書止之。恩退在六月，先生江陵之行在七月，或即奉詔止玄之役邪？（五）倅據本傳「州召生籍不就」，留此詩即是以疾乞假，至假滿則赴之，而終以疾辭，時桓玄方兼領荊江二州刺史，駐南郡，淵明以辭生籍至江陵。（六）古直從陶說，而釋「赴假」爲「乞假」。（七）梁啓超以爲當時淵明或僑居江陵。攷以上諸說，除倅「以辭生籍至江陵」及梁啓超「或僑居江陵」之說，最爲穿鑿無據外，其餘大抵以桓玄大逆無道，淵明不應爲其僚佐，故曲爲之辯。初不知桓玄作亂在元興元年（四〇二），是時逆跡未露，淵明爲其僚佐，固無虧大德也。當時荆揚南系軍閥，嘖嘖跋扈者？淵明初非自甘隱逸，常思有所憑藉以用世，其受桓玄徵辟，蓋亦事之極尋常者；况淵明此時，已深以軍閥跋扈，不能有所陳獻爲苦，故詩中有云，「投冠旋奮墟，不爲好爵榮，美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然則淵明赴假還江陵之際，亦即其決心辭職之時也。總之，淵明嘗仕於桓玄，殆無可疑，而其「投冠旋奮墟」，必在桓玄稱兵建康之

先，則亦無可疑者，惟所任何官及何年就職，則又無從考覓矣。

此外瀟明有懷舊居詩，其首句「瞻昔蒙上京」之「上京」，後人亦聚訟莫決，余曾撰「陶詩上京辨」，茲不復贅。

余嘗歎瀟明高風亮節，卓絕千秋，而其名字生年，聚訟莫決，任職去官，猶待考訂，覽遺集以慷慨，撰茲文而彷徨。若謂闡幽揚微，訂謬正僞，則吾豈敢。

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寫畢

憶 叔 琴

記得「八一三」的下一天，我到霞飛坊去訪叔琴，他悠然地在那裏翻閱着一本古書（大概是水經注，記不清了），微笑地對我說，「這一仗起碼打一年」。到現在，我們的仗已經打了兩年多，而叔琴竟不能看見勝利的到來，就跟我們長別了！

在分處各地的朋友中間，叔琴是我所常常憶念着的一個。他有豐富的學識，縝密的頭腦，熱烈的情感；然而他謹慎，謙虛，不自滿，不驕奢。有些小有才而沾沾自喜，滿臉驕氣的人，站在叔琴面前，就立刻顯出他們的小來。但叔琴因為過於謹慎，總不肯著書立說，到痛得十分危急時，只顧着四壁圖書而泫然淚下，竟沒有一部大著作留給我們。

叔琴如果早點著手著作，我相信他對於社會科學一定有很大的貢獻。雖然他過去替「一般」雜誌及「中學生」雜誌經常寫文章，但僅是些斷篇零簡，不能發揮他的學術思

想。他在「一般」雜誌的創刊號裏寫過一篇短文，題目是「一般與特殊」，現在高級的中學教本裏差不多都選入的。他說，「社會問題中的最大問題，就在乎怎樣才能夠提高大多數人的生活標準；文化運動中最重要的運動，就在乎拚命去提高大多數人的生活標準。這話在實際上確實是個難問題，或許竟是人類所永遠追求不盡的理想境界。可是理論方面的答案，那個簡單得很，可以一句話包括無遺地說：「要使特殊的一般化，同時也要使一般的特殊化」。社會問題的解決應該如此，文化運動的進行也應該如此。知識階級應該努力在第一點，實際運動者應該努力在第二點。……一般的特殊化，是生活或文化本身的提高；特殊的一般化，是使大多數人生活或文化的提高。這是一般的人們所應努力的目標，當然也是我們「一般」同人此後想要努力的目標，打算發達的大路」。真的，叔琴一生就依着這個目標去努力奮鬥。他埋頭研究社會科學（一般的特殊化），同時又在中學校授課，替書局編書（特殊的一般化）。他在那篇文章裏又告訴我們：「我們固然希望一切生活都會變成學問，都會不絕地向深化；但我們尤其希望各種學問都會

去滋養一切人們的生活，都會不起地向外普及」。然而叔琴竟不及從事於有系統的著作，把他研究所得的來滋養我們。

在這個時代裏，「死」真算不得一回事。那些爲國家民族而慷慨捐生的將士們，是死無遺恨的；那些參加抗戰工作的青年以及文化工作者，受了不及防或不可抗的侵襲時犧牲了生命，也是死無遺憾的；然而還有不死於敵人之手，而出乎意外地犧牲了寶貴的生命者，這纔真是死猶有憾。叔琴之死，當然不能說如前者那樣的死無遺憾，但也不能說如後者那樣的死猶有憾，因爲他是患病死的，而且患的是惡性腸癌，在醫學上還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不過我得了叔琴的死，總感到一種空虛的悲哀；他日抗戰勝利，我重回上海時，再從那裏去找這樣一位有豐富的學識，精密的頭腦，熱烈的情感，然而又謙價，謙虛，不自滿，不驕矜的朋友呢？

二十八年作

魯迅的戰鬥精神及其戰略

魯迅是一個戰士。但所謂戰士者，並不像堂·吉訶德那樣穿起盔甲，執着長槍，也不似舊小說中所描寫的什麼「面如重棗，聲若洪鐘」，只是平平常常的一個人。魯迅說過的：「戰士的日常生活，是並不完全可歌可泣的，然而又無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關聯，這纔是實際上的戰士」。

當魯迅幼年時代，正值中日甲午之戰（一八九四年，時魯迅十四歲），師徒擄敗，頗有大廈將傾之勢，而他的祖父又因事下獄，他的父親患着重病，他出入於藥店質庫者好幾年，國難和家變，逼着他走上奮鬥的人生的道途。他不從科舉中去求發跡，而投考江南水師學堂，又改入路礦學堂，已經是不甘隨俗沉浮，而抱有救國的宏願了。後來他到日本學醫，其原因之一，是爲了「確知道了新的醫學對於日本的維新有很大的助力」。不久日俄之戰發生了，他「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那將

魏朝的和旁觀的中國人，都是茁壯有力的，因此他「又覺得在中國醫好幾個人也無用，還應該有較為廣大的運動……先提倡文藝」，從此就棄了學籍，專和幾個朋友研究和介紹外國文藝。辛亥革命爆發時，他回國已經兩年了。那時候頗有新氣象，使他感到一點「小康」，他從那時候起，就做教育部的食事。一九二五年他寫信給許女士說：「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自然，那時惡劣分子固然也有，然而他總失敗」。但這一團光明的時期却很短，他說：「一到二二次革命失敗之後，即漸漸壞下去，壞而又壞，遂成了現在的情形。其實這也不是新添的壞，乃是塗飾的新漆剝落已盡，於是舊相又顯了出來」。在二次革命後的五年中間，他一方面在教育部任職，一方面辛勤地輯逸書，鈔古碑。他對於中國社會的「舊相」，知道得最清楚，觀察得最深刻，只要有機會，他一定會把那些「舊相」，「層一層剝露給人家看的。他的輯逸書，鈔古碑，並不是消極，也不是什麼「作無益之事，遣有涯之生」，他只是養精蓄銳，以待時機的到來。所以在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已

應出版到第四卷時，他就以戰士的姿態出現了。

他一開頭就提醒大家，一部歷史，「歪歪斜斜的每葉上都寫着『仁義道德』幾個字的舊禮教，反對崇拜偶像和保存國粹。他用了一番善濫，滿腔熱情，「精練的或者簡直有些誇張的筆墨，寫出或一羣人的或一面的真實來」；他寫的雜感文，沒有一篇不是，尖利而深刻，擊中敵人的要害，使敵人望風披靡。梁啓超常以「筆鋒常帶情感」自詡，魯迅則於「常帶情感」之外，更加上「深刻」，在「新青年」的執筆者中間，更沒有像魯迅那樣深刻而偉大的了。後來因時勢的激變，「新青年」的一羣人漸起分化，有的高邁，有的隱遁，有的墮落，有的變節（但自然也有更前進的），只有魯迅是「敢於直面慘怛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他還是「屹立着，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滋積的疑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永久成了勇敢的戰士。他和所謂「正人君子」們戰，和所謂「爲藝術而

「藝術」的人們戰，和「洋場惡少」戰，和所謂「第三種人」戰，在疾病委頓中，還寫信呵斥中國的托洛斯基的信徒們說，「你們的所爲，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爲人的道德！」他在大病前曾經對許女士說，「自從一九零六年，二十六歲中止學醫而在東京從事文藝起，三十年中間，祇是著述方面，已有二百五十餘萬言」。加上他所翻譯的所蒐輯的，一部「魯迅全集」遂超過了六百萬字。他平日除了著譯以外，還要替青年們看稿子，校書，覆信，他「是把別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他在一九三四年大病之後，身體漸見衰弱，在一般人總要設法休息一下了，他不但不休息，反而說，「有工作要趕快做」，從此他就一直趕快做，做到臨死前幾十小時纔放下他的筆。這種奮鬥不懈的精神，在過去，在當代，是找不出第二個人來的。

魯迅的戰鬥精神，有兩點值得特別提出來一說：第一是有犧牲，第二是不寬恕敵人。他說，「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犧牲。聽說拳匪亂時，天津的清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說要兩元，對他說行李小，他說要兩元

，對他說道：「路近，他就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可爲法的，而那幫性却大可以佩服」。他很慨歎於「中國一向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犧牲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所以他跟敵人作戰的戰略，第一就是「避」。他最反對所謂「中庸之道」，他說：「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等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爲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於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而古人所贊美的「犯而勿校」，「勿念舊惡」等等的所謂「忠恕之道」，也就是「中庸之道」的一端，所以他主張「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主張「打落水狗」，絕對不寬容敵人。他說：「犯而不校」是恕道，「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是直道。中國人最多是枉道：「不落水狗，反被狗咬了」。又說：「殺壓迫者即使沒有報復的毒心，也決無被報復

的恐懼，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及其幫閒們，這纔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他說他記得大病中「在發熱時，曾想到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別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下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他曾說過，「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麼什麼，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而他的韌性的戰鬥和不妥協的精神，正是醫治一切折中、調和、妥協等等壞根性的對症良藥。

X

X

X

X

魯迅曾自述他的戰略，說，「對於社會的戰鬥，我是並不挺身而出的。……歐戰的時候，最重「據壘戰」，戰士伏在壕中，有時吸煙，也唱歌，打紙牌，喝酒，也在壕內開美術展覽會，但有時忽向敵人開他幾槍。中國多暗箭，挺身而出的勇士容易喪命，這種戰法是必要的罷。但恐怕也有時會遇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

兵相接」。但事實上魯迅作壕壘戰的時候少短兵相接的時候多。而且他常常是單身應戰的，他曾在他作的散文詩裏，描寫過這樣的一種戰士：「要有這樣一種戰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土人而背着犀皮的毛瑟槍的；也並不疲憊如中國綠營兵而却佩着盒子砲。他毫無它鑿於牛皮和鋼鐵的甲冑；他只有自己，但擎着蠻人所用的脫手一攔的梭槍。他走避無物之陣，……但他舉起了投槍。他微笑，偏側一擲，却正中了他們的心窩。……」這舉起投槍，偏側一擲的戰士，正是描寫他自己。他又說，「我有時也想驅除旁人，到那時候還不棄棄我的，即使是毒蛇鬼怪，也是我的朋友。倘使並這個也沒有，則就是我一個人也行」。

這種單槍匹馬，「就是我一個人也行」的作戰方法，究竟不是很好的戰略，而且不免帶有個人主義或英雄主義的色彩。一九二七年後，他就受了「創造社」的「圍剿」。如果魯迅真是個人主義者，他受到了這種無情的攻擊，一定還是單身應戰下去，而且他一定要固執着：你說我「有閒」，我偏要過着有閒的生活，你說我「講趣味」，我偏要

講趣味（周作人就是這樣的）。然而魯迅却不知此，他一面應戰，一面却在那裏認真地看了許多新的文藝理論的書，結果是：他看出對方雖然不免幼稚、空虛，但立論的主旨是不錯的，「圍剿」他的是他的友軍，不是他的敵人。而且他覺悟到「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階級分子的壞脾氣」。于是他提出了下列的幾點意見：第一，對於黨社會和黨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第二，戰線應該擴大。第三，應當造出大眾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的人還要「忍」。第四，聯合戰線應該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後來他又告辭大家：「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却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權，却不是騙人，他利導，却並非迎合。他不看輕自己，以為是羣衆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當作自己的傀儡。他只是大眾中的一個人，我想，這種可以做大衆的事業」。從此以後，魯迅不只是舉起投槍，單身走入「無物之陣」的英雄

，而是加入革命隊伍，作「報」的戰鬥的戰士了。

同時，魯迅知道得很清楚：「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過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越極目的是越為歧異的。或者為社會，或者為小集團，或者為一個個人，或者為自己，或者簡直為了自殺。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為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為目標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墮隊，然而只要堅持於進行，則愈到後來，這隊伍也就愈成為純粹、精銳的隊伍了」。事實證明魯迅決不會退伍，也決不落荒，他永遠是向前進行，做了「純粹精銳的隊伍」的領導者。

X

X

X

X

這樣的一位戰士，讓我們而去，匆匆地已經三週年了！這真是一個不可補償的損

失！

記得三年前，魯迅的遺骸陳在萬國殯儀館特設時，有幾位青年對於遺骸並不感慕，而上海却有二三家報紙，在那裏大談其「魯迅的缺點」，他們以為魯迅的尖刻的筆調，對於青年是不可爲訓的，其他還說什麼什麼，我現在記不清楚了，當時我記起魯迅的話，他說：

「戰士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唱着，營營地叫着，以爲得意，以爲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牠們。於是乎蒼蠅們即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爲倒是不朽的聲響，因爲牠們的完全，還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免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着翅子，還不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現在這位戰士戰死已經三年了，我們到處還聽得見那些莽撞們的讟罵之聲。

呸，去罷，你們這些蟲豸們！

『附記』本文括弧內所引的，都是魯迅先生的話，爲省篇幅，不一一註出篇名。

魯迅逝世三週年作

魯迅與青年

——兒童難以慷慨，談茲文而懷感

魯迅先生是從來不以「青年導師」自居的。他曾拿山羊來比喻那些自以為引青年向「正路」前進的導師們。他說：

「在我的故鄉不大通行喫羊肉，因狼甚，每天大約不過殺幾匹山羊。北京真是人海，情形可大不同了，單是羊肉鋪就兩百有是。雪白的羣羊也常常滿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們那裏稱羶羊的。山羊很少見；聽說這在北京卻頗名貴了，因為比胡羊聰明，能導領羊羣，悉依牠的進止，所以牧家雖然偶而殺幾匹，却只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牠。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頸子上還掛一個小鈴鐺；作為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羶的却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

，撲撲擠擠，浩浩蕩蕩，隨着柔順有餘的眼色，照定他忽忽地競賽他們的前程。
我看見這種認真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裏總想開口向他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往那裏去？』」（「一個比喻」，一九二六年。）

因此，他自己固然不願以「青年導師」自居，同時還勸青年們不要去尋求什麼導師。他說：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幸氣：自知的階不敏，自評的果最難得嗎？凡自以爲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但發而已，自己却誤以爲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過他的目標，何至於還在做導師。說佛法的和尙，賣仙藥的道士，將來都與白骨是「一邱之貉」，人們現在却向他教生西的大法，求上界的真傳，豈不可笑」。（「導師」，一九二五年。）

「我也會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路走的路。他們

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於發見他們心底裏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這個與那個」，一九二五年。）

但魯迅先生並不是主張叫青年不要動，不要向前進，相反地，他主張青年應該活動，應該用自力來克服一切困難。他說：

「青年們又何須找那掛着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森林，可以開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掘掘井泉的。開什麼荆棘蕪塗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導師！」（「導師」，一九二五年。）

「我們憎惡的所謂『導師』，是自以为有正路，有捷徑，而其實却是勸人不走的人。倘有領人向前者，只要自己願意，自然也不妨追趕前往；但這樣的勸導，怕中國現在還找不到罷。所以我想，與其找胡塗導師，倒不如自己走，可以密

却尋覓的工夫，楷豎他什麼都不知道。至於我那「遇見森林，可以開成平地」；「這話，不過是比方，猶言可以用自力征服一切困難，並非是真勸人到山裏去」。（「田園思想」，一九二五年。）

「人類爲向上，即發展起見，應該活動，活動而有若干失錯，也不要緊。倘獨半死半生的苟活，是金錢失錯的。因爲他掛了生活招牌，其實却引人到死路上去」。（「北京通訊」，一九二五年。）

「世上如果還有真懸宕下去的人們，就是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種可憐的地方發了可憐的時代」。（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青年們，先可，將中國變成一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勇敢出進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開了古人，將自己的真心話發表出來」。（「無聲的中國」，一九二七年。）

爲要前進，所以凡一切阻礙前進的，都應該踏倒他。他說：

「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滋養，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否古今，是人鬼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製膏丹，全都毀倒罷！」。（「忽然想到」，一九二五年。）

因為中國是一個歷幾千年的封建社會，所傳下來的「古書」，全充滿着封建意識及頹唐和厭世的思想，足以阻礙青年的向前發展，所以他教青年們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他說：

「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沈沈下去，與實人生離隔；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交接觸，想做點事。

「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語，也多些極端的悲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

「我以為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

「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

，不是「盲」。只要是污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青年必讀書」，一九二五年警京報副刊閱。）

他更從反面指出古書所給予青年的毒害：

「我們這會經文明強國後來幸遇過些古人滿湖人大哥的國度裏，古書實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讀一點可以知道，怎樣敷衍，偷生，腐結，弄樞，自私，然而能夠假借大義，竊取美名」。（「十四年的『國經』」，一九二五年。）

當時頗有一小部分的青年，受了魯迅先生這些話，覺得奇怪，他們以為魯迅不是來滅中國的外國人，何以竟勸我們不要讀中國書？魯迅先生回答說：

「我以為如果外國人來滅中國，是只教你時能說幾句外國話，却不至於騙你多讀外國書，因為那書是來滅人的人們所說的。但是還要獎勵你多讀中國書，孔子也還要更加崇拜，像元朝和清朝一樣」。（「報『奇哉所聞……』」，一九二五年。）

但如果一定要讀中國書呢，他主張與其讀經，毋寧讀史。他說：

「我以為伏案過未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啣線裝針。倘其吟嘯日久，對於舊書有些上癮了，那麼，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史，而且尤須研史，或者看雜說」。（「讀經與讀史」，一九二五年。）

魯迅先生教青年要正視現實，抓住現在，要有犧牲的反抗，要不恥做失敗的英雄。

他說：

「中國人的不致正視各方面，用暗和弱，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逃路上，就證明着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踏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墮落着，但却覺得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一九二五年。）

「仰慕往古的，同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快離開罷！現在的地土上，應該是執着現在，執着地上的人們居住着」。（「雜感」，一九二五年。）

「將來是現在的將來，於現在有意義，終於將來有意義」。（「論第三種人

」，一九二二年。）

「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弱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屠戮的武人，少有敢撫髮叛徒的軍客，見勝兆則紛紛棄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跑者，和見了這軍旗夜着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是中國將來的脊梁」。（「最先與最後」，一九二五年。）

「無論是什麼——信，異性，國，民族，人類等……只有糾纏如毒蛇，執着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雜感」，一九二五年。）

「世間有一種無類精神。那裏就是母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最感惡，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說要兩元，對他說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遠，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是不足爲法的，而那惡性却大可佩服」。（「娜拉走後怎樣」，一九二三年。）

魯迅先生一方面鼓勵青年去活動，奮鬥，一方面把舊社會的醜惡，剝給青年看，然而他說話却非常鄭重，他說：

「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為可以走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荆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的罪。」（「北京通訊」，一九二五年。）

「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達意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殺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裏掏出來放在我手裏。那紙上還帶着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寫文字時，還常使我害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這紙不敢下筆。」（「墳」後面，一九二六年。）

「三一八」慘案發生時，魯迅先生憤怒到了極點，他呵斥那些殺人的兇手們說，「

負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無花的教書）！一方面他鼓勵青年們繼續奮鬥。他說：

「苟活者在淡紅的血色中，會依稀看見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將更奮然而前行」。〔「紀念烈和珍君」。〕

他以為受了這一次的教訓，青年們以後應該用別一種的戰鬥方法了。他說：

「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血的應用，正如金錢一般，吝嗇固是不行的，浪費也大大的失算。

「這同死者的遺給後來的功德，是在拚去了許多東西的人相，露出那出於意料之外的陰毒的心，教給繼續戰鬥者以別種方法的戰鬥」。〔「空談」。〕

然而所謂「別種方法的戰鬥」，究竟是什麼方法，他沒有明白說出來，這便是他的慎重之處，他怕把青年「引入危塗」。後來經過一九二七年的大變動，他在答復一位青年的信裏說：「我恐怖了。而且這種恐怖，我覺得從來沒有經驗過」（答有恆先生）。

他又悲慨地說：

「我的一種妄想破滅了。我至今為止，隨時有一種樂觀，以為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這種老人漸漸死去，中國總可比較地有生氣。現在我知道不然了，殺戮青年的，倒似乎大概是青年，而且對於別種的不能再續的生命和青春，更無顧惜。」（同上。）

接着他又悽憤地嗚咽地說：

「我會聽說過：中國歷來排着喫人的雞席，有喫的，有被喫的。被喫的也會喫人，正喫的也會被喫。但我現在發見了，我自己也幫助着排筵宴。先生，你看我的作品的，我現在發一個問題：歪了之後，使你麻木，還是使你清楚；使你昏沈，還是使你活潑？倘所覺的是後者，那我的自己裁判，便證實大半了。中國的筵席上有一種「醉蝦」，蝦越鮮活，喫的人便越高興，越暢快。我就是做這醉蝦的幫手，弄壞了老實而不幸的青年的腦子和弄壞了他的感覺，使他萬一遭災時來嘗加倍

的苦痛，同時給懂懂他的人們賞玩這較重的苦痛，得到格外的享樂」。(同上。)

是的，魯迅先生弄壞了青年的頭腦，弄壞了青年的感覺，然而屠殺青年的責任却由有人負着，無情的歷史已經記下了他們的罪惡，跟魯迅先生沒有絲毫關係；而且歷史告訴我們，青年的血也沒有白流。我們如果一定要指出魯迅先生還有什麼欠缺（但不是錯誤）之處，那麼我想只有兩點：第一，他只教青年要活動，要前進，可憐他總不敢指示青年怎樣去活動，向什麼方向前進；第二，他只教青年用自力克服一切困難，只教青年與朋友聯合起來，沒有指出個人與羣衆的關係——這一句，他自己過去也沒有看得怎樣清楚的，所以他自己的戰鬥方法，是：「毫無乞靈於牛皮和廢鐵的甲冑；只有自己，但拿着鐵人所用的，脫手一擲的投槍，……走進無物之陣……舉起了投槍」(「這樣何戰士」，一九二五年)。

然而，這位老戰士，他是永遠跟着時代前進的。他後來自己覺得：「我時時以我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在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悶，萃於一身，在替

大衆受難似的；也正是中產的知識分子的摸樣氣」（「二心集序言」一九三三年）。於是他接著說，「只是原先是常思進德總的本體教，毫不顧惜他的積蓄，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爲從新興的無產者沒有將來，却是的確的」。

從此以後，他自己固然參加了團體活動，同時還用這樣的語來指示青年：

「人固然應該生存，但爲的是進化；也不妨受苦，但爲的是掃除一切苦；更應該戰鬥，但爲的是改革」。（「論泰理奇夫人事」，一九三三年。）

「由歷史所指示，凡有改革，最初，總是覺悟的智識者的任務。但這些智識者，却必須有研究，能思索，有決斷，而且有毅力。他也用禮，却不是騙人，他利導，却並非迎合。他不看輕的己，以爲是大衆中的戲子，也不看輕別人，他作自己的咳嗽。他只是大衆中的一個人，我想，這纔可以做大衆的事業」。（「四外文談」，一九三四年。）

「每一革命部隊的突起，戰士大抵不濟是反抗現狀這一種意思，大略相同，

終極目的是極爲歧異的。或者爲社會，或者爲小集團，或者爲自己，或者簡直爲了自愛。然而革命軍仍然能夠前行。因爲在進軍的途中，對於敵人，個人主義者所發的子彈，和集團主義者所發的子彈是一樣地能夠制其死命；任何戰士死傷之際，便要減少些軍中的戰鬥力，也兩者相等的。但自然，因爲終極目的的不同，在行進時，也時時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頹唐，有人叛變，然而只要無礙於進行，則奮到後來，這隊伍就愈成爲純粹精銳的隊伍了」。（「非革命的革命奮進論者」，一九三〇年。）

無論魯迅先生怎樣自己聲明不願做青年的導師，然而他的言行，無疑是青年們的最好的導師。這樣的一位導師，這樣的一個戰士，現在離我們而去已經三年了！然而他的教訓，他的戰鬥的精神，將永遠活在每一個前進的青年的心裏。他自己也說過的：「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的死掉了」。（「空談」，一九二六年）。

從章太炎談到劉申叔

章太炎先生死後似乎很冷落。年青一代的，對於這位革命前輩，顯見得生疏了。而學精空氣又那麼淡薄，對於這位博大精深的前者，要了了解他也不大容易，因此他一顧之後，漸漸被人家忘却了。

其實我們只要一翻閱現代中國史或中國革命史之類，就可以看到四十年前有一位知識青年，因為堅決主張革命，在上海租界跟蹤被捕，從容對簿，琅琅入獄。這位青年，便是五年為寫文章宣傳革命，在上海租界跟蹤被捕，從容對簿，琅琅入獄。這位青年，便是五年前在蘇州逝世的章太炎。我們只要一翻查清末革命文獻，便可看到慷慨激昂的「討論滿洲敵」，詞嚴義正的「嚴康有為論革命書」；又可以看到「中華民國辨」，知道中華民國這一名稱的由來。寫這些文章的，便是五年前在蘇州逝世的章太炎。我們再往後一點看，在民國初年，袁世凱氣煞萬丈之際，有誰以大勳章作局陞，闖入總統府，大罵袁世凱

費心齊辟民國的？在民國初年，封建軍閥割據一方，萬分跋扈之際，有誰敢寫文章大罵吉林都督陳昭常是屠殺革命志士的兇手的？那不是章太炎是誰？我們再看到五年前，當北平學生運動如火如荼，而學者名流大叫學生應埋頭讀書的時候，偏有人以革命元勳的資格出來替學生說話，以爲「學生階級，事出公誠，縱有加入共黨者，但問今日之主張何如，何論其平素」。這不是章太炎是誰？歷史使中國的革命發展得異常迅速，單純主張種族革命的太炎先生，到晚年來顯然有點趕不上時代了，然而他的一貫的「嚴夷夏之辨」的理論，對於目前的民族抗戰，還是適用的。而況他始終保持了革命家的風度，他生平沒有一句違反國家民族利益的言論，他獨身沒有一根取悅權貴的趨骨。查棺論定，太炎先生是值得我們紀念的。

要成功像太炎先生那樣的一個人，並不是容易的，不但要有淵博的學問，還須有堅實的節操與大無畏的精神。清朝末年，革命黨人隨時有遭受變身之禍的危險，再加上潛起大吏的威逼利誘，意志不甚堅強的，往往因之而退縮、逃避，甚至於變節。章太炎的

在上海被捕，據說是由於同黨人的告密，確否我們不知道；但與章太炎同時參加革命而且學術文章幾乎與章氏齊名的劉申叔（師培，一字光漢），却表演了一幕出賣同黨的醜劇。〔本中國革命史上有着這樣一段的記載：

「己酉年夏，黨人陳其美、張恭、王金發、周淡游、褚輔成等在上海有所計畫，專為劉光漢、汪公權所聞。光漢鼓吹排滿有年，為有名之文學家，時任民報撰述，以為其矯何振所挾持，且與章炳麟、陶成章意見不合，遂變節歸上海，密充江督端方偵探，至是乃以所得報告端方，端向英租界當局交涉，派巡捕查抄黨人機關，捕去張恭一人，周淡游、褚輔成以變阻工人得免。王金發怒，挾槍見光漢，將殺之，光漢懼，許以必為保全張恭，恭因不死，光漢由是不敢再至上海。」

知識分子由其本身所具有的弱點，當生死關頭，往往容易動搖退縮，但也只有知識分子，對於是非顛逆格外靈敏得清楚。所以往古來今，做據實前赴顯要走狗約，甚至於出賣朋友以求脫禍或藉此以求進身的，大都是知識分子，而堅持自己的主張，視名節重

於生命，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也大都是知識分子。劉申叔代表了前一種知識分子，章太炎則代表了後一種。不過變節動搖的知識份子，雖然一時脫了兩惠或竟因此而顯赫起來，但回頭來還是毀滅了自己。我們只要看劉申叔，到而今「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只剩幾種關於音韻學等的著作，偶然還被人稱述；而章太炎的姓名，的著作，將炳彪千古，永不磨滅。

所以，歸根結蒂，變節實在是一種惡毒的行爲。但在所謂救世擁護之際，士大夫既看鍾名節，而告密、刺探等作風，提倡鼓勵者又大有人在，因此，爲真理，爲信仰，百拙不拙，移姑如一者俯視，而冒沒奔騰，投機取巧者滔滔皆是也。從這裏說開去，要牽涉到民族道德問題，我想就此帶住。不過我又聯想到另外一些事情，不妨在這裏附帶說一說。我覺得四十年前的士大夫，其投機取巧處遠不及後來的一部分青年來得聰明。劉申叔充端方密探，出賣同盟之後，便「由是不敢至上海」，而後來的一些任鈞拒刺擁護工作的人，他們可以永遠裝出一副前進的革命的面目，把被賣的裝在皮鼓裏，使他到死

還不知其所以然。而尤其聰明的，他不用充密探、賣同黨等導劣方法，只要找一個機會，寫幾篇文章就成了。譬如有人說魯迅是左翼作家，思想要不得，他便寫文章來把魯迅罵一頓，這樣就顯得他不是左翼作家，思想要得了。又譬如國際間發生一個什麼問題，他可以不從這問題的本身上去分析研究，而借端向制度和我們不同的國家，提出一個慷慨激昂的「我們的抗議」，既英勇，又穩當，從此人家就不會把「危險分子」的考題加到他身上，而他還是做穩了愛國的文藝家，豈不一舉兩得也乎？不過在另一方面，卻也因此而顯露他自己的原形，告白他自己的沒落，歸槓結蒂，這是愚蠢的。

——一九四一年六月，爲紀念太炎先生逝世五周年作

回憶太戈爾

印度「詩哲」太戈爾第一次來到中國，在民國十三年春夏之交；伴同他來的，是我們的「詩哲」徐志摩。那時候，世界資本主義又進入暫時穩定時期，帝國主義重振旗鼓，來向我們侵略了。過去大喊「西方科學破產，東方精神文明勝利」的，到那時候已偃旗息鼓；而玄學與科學的論戰也告結束，據說是科學深勝利的；但同時我們有一種新思想運動却在瀾激增長。這種新思想運動，是反對所謂精神勝利法，也反對逃避現實的。不幸那位「詩哲」却告訴我們要從自我遺忘的快樂上創造出藝術來；要求我們把我們的思想，離開單純的機械生活，把我們的靈魂舉到天上。總結一句話，要我們不正視亂世的現實，而逃避到一個從我們心靈上所創造出來的快樂的太虛境界裏去。因為這樣，當時一些「後生小子」，對於這位大詩哲頗有不甚瞭解之處，甚至於不成興趣。

就年齡說，我在當時也是「後生小子」，可是我對於這位詩哲倒頗感興趣。原因是

我在杭州因詩哲徐志摩之介紹，和他握過一次手，吃過一頓飯，并且恭聆了他的夜鷹歌唱般的富有詩意的講演（敘述到這裏，怕讀者要有「肉麻」之感吧？我得鄭重聲明，我僅僅和他握一次手，在一個大宴會裏敬陪一次末座而已，我和他沒有交談，因為我不能說英國話，事後也不會和他通通信，因為我不會寫英文或梵文）。我還記得那一次的講演是在省教育會舉行的。太戈爾先生穿着長袍，高立在講演臺上，長髯被微風吹動，飄然大有神仙之概。他開始講演——不，歌唱了。歌唱一詞，照例要輪到我們的詩哲徐志摩來翻譯了，可是徐詩哲沉思一下，慢慢地立起來，很莊嚴地對臺下聽衆說：

太戈爾先生用詩來替我們解釋人生，來安慰我們。他講的話，一句一句都是詩。詩是不能翻譯的，翻譯它就是褻瀆它。你們已經見到太戈爾先生的風度，已經聽到太戈爾先生的聲音，你們是有福了。聽呀！他那裏是在說話，簡直是夜鷹在歌唱——這是一種天籟。你們再聽他唱罷，我是不能翻譯的」。

臺下起一陣小小的騷動。徐詩哲輕輕地在太戈爾耳邊說了幾句話，坐下來，對臺下

和照樓的遊衆證一證眼，彷彿說，「呸，你們這些蠢材！」於是太戈爾又歌唱了。我閉目靜聽，彷彿真是鳥兒在樹頭歌唱，可惜我不會到過歐洲，沒有聽過夜鷹叫，如果改用中國的成語，那麼，「百喙黃鸝」，庶幾近之。

我正聽得出神，臺下又起了一陣騷動，許多紙片從廂樓上飛下來，順手接過一張來看，大概寫着一些「我們歡迎太戈爾先生來中國，但我們不歡迎太戈爾先生把他的那套哲學來宣傳」云云（意思大概如此，原文已經忘記了）。好在太戈爾先生不認識中國字，也就含糊過去；但徐詩哲似乎動怒了，散會後他對我說：

「胡鬧！中國人就是這樣愛胡鬧！淺薄，無聊，沒有熱情，不夠誠懇。人家拿出『心』來給我們看，我們却把它刺傷了。」

好在徐詩哲也知道那些紙片兒的來歷是跟我沒有關係的，所以他發幾句牢騷以後，又跟我談太戈爾了，他說，「太戈爾最討厭新聞記者，因為他們喜歡胡鬧，所以我今天跟你介紹時，只說你是我的朋友，沒有說你是新聞記者」（那時候我是在做新聞記者）。

與陳成謝徐諸君的盛意之外，再也沒有話說。

太戈爾第二次來到中國時（不知是民國幾年，我記不起來了），徐詩哲到輪船碼頭去接他，同去的還有郁達夫先生，徐詩哲望見那輪船快要靠近碼頭時，輕輕地對郁先生說：「太戈爾的悲哀是孔子的悲哀」（見郁達夫所寫「回憶志摩」）。這句話頗有詩意，不是我們俗人所能瞭解，且不去管他；我只記得這一次歡迎他的，似乎沒有上一次那樣熱烈。不久徐詩哲因坐飛機而殞命，我們與太戈爾之間就失了聯繫，雖然還有譚雲山教授常常去印度，跟太戈爾見面，可是譚教授是不懂詩的，請他來介紹太戈爾，總覺得隔一層。

我們雖久不讀太戈爾的新作，然而抗戰以來，他老先生所給予我們的精神上的援助，使我們受到極大的感動。他曾以嚴正的責難，斥責替日本軍閥說話的「詩人野口」；他以最大的同情和信心，寄與艱苦抗戰的中國朋友；他相信我們將「由英勇犧牲之中，而發生一新國家與新民族生命」；他這次不再教我們避開現實去懸想一個崇高的理想境

界。太戈爾的心腸是好的，他是佛陀的慈悲心腸。一個人只要有他的中心信仰，無論唯心也好，唯物也好，對罪惡與正義決鬥時，他總是站在正論方面的。

消息傳來，太戈爾先生病逝了！我們謹在這裏遙致哀敬。同時使我們懷念着拘囚在牢獄裏的尼赫魯先生。因為太戈爾畢竟是一位宗教式的理想家，他要求印度人的是：「讓我們學習受苦而不恨，犧牲而不失望；讓靈魂除了永久的正直以外不向別的屈膝」；他只有單純的「愛」，而沒有「憎」。尼赫魯則愛憎分明，他熱烈地愛着印度，愛着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同時他也熱烈地憎惡着壓迫印度和壓迫其他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者。他告訴印度人說，「對於我，社會主義不僅是我所贊成的一種經濟原則，它並且是我以全力擁護的一個重要信條」。在目前的印度，一個實踐的革命領袖，比一個悲天憫人的詩人更要得多。

紀念吳檢齋

「東南第一天都峯，曾凌極頂擴心胸。俯視欽州沉雲海，地靈人傑秀氣鍾。沈沈烈士生其地，少年已是珊瑚器，鼓篋期成撥亂才，登車夙負澄清志。津海師說感人深，詩世須俾出世忱，無畏獨超生死海，有情還契涅槃心。書生結習未能革，皖學風微深自責，古晉江藏淵淵源，禮制金程加考聚。一編薈漢記微言，降脫親承大義存，商賂春秋傳賈誼，攘除夷狄金劉琨。遠陽擾攘風雲起，蠶食鯨吞不能已；乞師寧向西鄰哀，蹈滄願由東帝死。匡時致遠改兼綸，政制無須陳復陳；獻運天鈞陶甑子，大張漢幟振斯民。盧溝戰越名捕始，黃金白刃均無視；文檄紛披萬國橋，網羅密網天津市；誓死不辱氣吞胡，拚將粉碎千金軀；請看志士阻支解，足抵揚州十日屠。吁嗟乎，墨翟已死滄蠶繼，弟子三百氣尤厲。烈士精神不滅曆，大名永與天都價」。

上面是朱希祖先生爲哀悼他的同門吳棟齋（承仕）先生而作的「天都烈士歌」。雖然聯聯數百字，已把吳先生的籍貫、學歷以及怎樣裝身成仁等等，都寫出來了。按吳先生於前年九月二十一日被日寇在天津加害，消息傳到重慶，已在十一月中；因爲吳先生一向在北方教書，所教的又是屬於「古典」（即所謂國學）一類的，所以在南方的一般青年，不大知道他，其實吳先生晚年來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歷史，北方青年大都是熟悉的，而朱先生那首歌，對於這一段歷史却寫得太簡單了。

我沒有去過北平。據從北平來的青年朋友說，北方的進步知識分子，沒有人不知道「吳老頭子」的，所謂「吳老頭子」，並不是「五四」時代的吳稚暉，而是「九一八」以後的吳檢齋。自從「遼陽擾攘風雲起」，他就「匡時致遠改經綸」，把他所愛好的經籍古書的研究，三禮名物的研究都擱置了，專心來領導青年做文化運動。他是「營業學會」的發起人之一。在他編輯或支持之下的新刊物，有「文史」季刊及「壹旦」，「時代文化」，「文化動向」等半月刊。當時坐鎮南方的有魯迅先生，坐鎮北方的便是「吳老頭

子」，將來編中國新文化運動史的，當然會有更詳細的敘述，這裏不用多說。

盧溝橋事變起來，他隻身離開北平，匿居天津租界上一個亭子間裏，跟他往還的都是些青年，他的書架上也只剩幾本經他翻翻批注過的「反杜林論」之類的「洋裝書」了。他和家中斷絕音問者兩年多。二十八年七月，他的同門汪旭初在重慶忽然接到他一個電報，說：

「始遭名捕，繼復利誘，夙承師訓，義不辱身，兩年以來，日撰抗敵文告及秘密文稿不下三十萬言，誠恐津局一變，音問將絕，故略陳近況」。

之後，南方的朋友都不知道他的消息，一直到前年十一月中，纔傳來了他的死耗。

在中國歷史中要找這樣「見危授命」的氣節之士並不難；所難者，像他這樣上了五十多歲年紀的人，向來又是研究古典學的，而一朝發憤，拋開古典，重新來學習社會科學，俯順難關安樂的家庭，犧牲大學教授的地位，來幹地下工作，在敵後恐怖之下勇敢衝鋒鬥，終至殺身成仁，表現了崇高可敬的民族氣節。而尤其可貴的，是他始終保持着

的那種「青年氣」。中國人大抵一過四十歲，便漸難可憐，安守現狀，怕談改革，自以爲持重，而詎青年爲存焉。不必舉遠例，但看「五四」以後的二十年間，有多少人漸漸退嬰，漸漸落伍，甚至反過臉來壓迫青年了。而吳先生則年齡越增添，思想越進步，他一點不妄自尊大，反向青年去學習，這種精神，是中國人所缺少的。可笑現在一般擺起「學者」架子的「教授」之流，玩弄古典，高談學術，自命淹博，識不起救亡青年，以爲他們幼稚淺薄；「看到所謂「抗敵文告」，便搖頭嘆「八股，八股」，我不知道他們在吳先生面前，有沒有「自慚形穢」之感？

「墨翟已死滑釐繼，弟子三百氣尤厲」，其實吳先生弟子何止三百！他的軀殼雖被敵人支解，他的精神永遠充塞宇宙間。魯迅說得好，「死者倘不埋在活人的心中，那就真正死掉了」。我們的吳先生沒有死。

回憶許地山

二十年前就愛看許地山先生（落華生）的小說，直到七年前纔在上海見到他，他所給我的印象是輕鬆和愉快。他會喝酒，會講笑話，隨隨便便，一點沒有「學者架子」或「作家氣」。後來他到香港大學教書去了，我和他不能算是怎樣熟識的朋友，因此就不會通通信，然而他的朗爽面又有風趣的聲香笑貌，始終印在我的腦子裏。

自從「空山靈雨」、「綴網勞蛛」、「命命鳥」等集子陸續出版後，許先生就把他的作家生活告一結束，從事於宗教哲學的研究了。慚愧，我沒有能夠多多看到他的關於這方面的著作，前年在桂林，買到他的「道教史」上册，但下册至今還沒有看到。「道教史」在中國是筆跡疊複之作。我常常想，道教對於中國的影響要比佛教大得多，而竟沒有「一部道教史」，可見中國學術界是如何的貧乏與空疏呵！現在有許先生從來事道教史的整理與研究，將來必大有收穫，而他的篤實真切的為學態度，也從這裏表見出來了。去年

冬天，接到魯之先生寄來一篇題爲「運氣思想和條件心理」的文章，原來是替許先生近著「扶乩迷信研究」所作的序文，我纔知道許先生在這方面又有新著作，但到現在還沒有能夠讀到。不但整部的著作，連零星散篇的文章都很難看到，而消息傳來，許先生竟作古人了！

從別人寫的紀念許先生的文章裏，知道許先生於本年七月中曾在香港「大公報」發表過「國粹與國學」一文。他指出「一個民族在物質上、精神上與思想上，對於人類，至少是本民族，有過重要的貢獻，而這種貢獻是繼續有功用；繼續在發展的，才可以被稱爲國粹」。又指出「學術除掉民族特有的歷史，是沒有國界的。民族文化的淵源，固然要由本國的歷史中尋覓，但我們不能保證新學術絕對可以從其中產生出來。新學術要依學術上的問題的有無，與人間的需要的緩急而產生，決不是無端從天外飛來的」。因此他認爲「要知道中國現在的境遇的真相，和尋求解決中國目前的種種問題，歸根還是要从中國歷史與其社會組織，經濟制度研究入手」。從這短短的幾段文字中，我們可以

看出許先生頭腦的清醒，認識的正確。近年來中國學術界真是烏烟瘴氣，「五四」時代所已打倒的「國粹論」重復抬頭，而他們的所謂「國粹」，其實是「國渣」。他們從渣滓裏淘出些東西來，以污蔑世界上一切新學說、新發明，飛機可以推源到墨子的飛禽，坦克車等新式武器可以誇功到諸葛亮的木牛流馬，從而「五四」傳統可以推翻，陰陽五行之說可以重新提倡，而理往往可以代替理智，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可以代替新哲學了。現在許先生告訴他們，「民族文化的淵源，固然要由本國的經史中尋覓，但我們不能保證新學術絕對可以從其中產生出來」，這一個當頭棒喝，至少可以喚醒一些昏昏未深的迷古論乃至復古論者。中國目前充斥着曲學阿世，冒沒奔馳之徒，而缺少腳踏實地，從事於學術研究的人。像許先生那樣一位篤實的學者，如果能長壽一齡，他對於中國學術界的貢獻，一定是很大的。

許先生不僅是一個學者，同時是一位文化鬥士，過去「五四」時代，他已經有很多的勞績，抗戰以來，香港的文協分會是在他的領導之下進行着種種鬥爭工作的，所以許

先生之死，不僅失去了一位篤實的學者，同時也失去了一位堅毅勇敢的文化鬥士。

許先生死了，他的聲音笑貌還深印在我的腦子裏。我現在沒有別的希望，只祈求着儘早日看到他的全部遺著。

奔放的感情，縝密的頭腦

——祝郭沫若先生五十壽

五四以後，開始用新形式寫長詩的，是郭沫若先生。記得在「時事新報」的副刊「學燈」裏，讀到他的「鳳凰涅槃」，使我非常高興；正和五四前一年在「新青年」上讀到魯迅先生的「狂人日記」一樣，立刻覺得這是一篇劃時代的作品。在「鳳凰涅槃」未發表之先，我所讀到的新體詩，在形式上，大都是所謂「半新半舊」，像女子的「放大腳」一般；在內容上，大都囿乎哀景或者說理。缺乏一種奔放的憤慨。而郭先生這首詩，不但一點不受舊詩詞的影響或拘束，還流露出極端不可遏制的熱情，使讀者反想詠歎，不暇釋手。郭先生自己說得好：「那首詩是象徵中國的再生，同時也象徵着自己的再生」。

郭先生仗着這種奔放的情感，一直向時代前面跑，到五卅以後，再來一次「鳳凰涅

察」，他大喊着：

「四五年前，白話文革命，在破了的絮襖上雖然打上了幾個補綻，在污了的粉壁上雖然塗上一層白墾，但是裏面依然是敗絮，依然還是糞土。

「光明之前有渾沌，創造之前有破壞，新的酒不能盛容於舊的革甕。鳳凰浴再生，要先把屍骸火葬。自我的事業，在目下渾沌之中，要先從破壞做起。我們的精神，爲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

這是「創造社」的革命文學運動的宣言，也就是郭先生開始從事於革命文學運動的宣言，從此郭先生就走上了革命的大道。

一九二七年以後，郭先生爲了環境關係而離開他所熱愛的祖國，到海外去作「逐客」，使他不能不把奔放的感情抑制下來，埋頭從事於學術研究。他所研究的是中國古代社會。他說：

「對於未來社會的展望逼迫着我們不能不生出清算過往社會的要求。古人說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認清楚過往的來程也正好決定我們未來的去向」。

郭先生的感情是奔放的，頭腦是縝密的。有着奔放的感情；總能寫出那如長江大河一瀉千里的詩篇；有着縝密的頭腦，總能從學術研究上去推算中國過去的社會；也正惟其有縝密的頭腦再加上奔放的感情，總能不被「考據」所拘圍，總能不歸別人「窮研窮詰，遂成無用」的覆轍。他拆毀了「周易」的神祕的殿堂，刻下了「詩」「書」的神祕的外衣，商龜周鼎，到了他手裏，就失去了「骨董」的作用。和他同時，儼然以「學者」自命，從事研究中國社會史的如陶希聖之流，古字全不認識，古書更未讀過，借此招搖撞騙，作政治投機的敲門磚。自郭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問世，一切曲解中國歷史，改造中國歷史的謬說，都掃蕩了。他告訴我們：

「只要是一個人體、他的發展無論是紅黃黑白，大抵相同。

「由人所組織成的社會也正是一樣。

「中國人有一句口頭禪，說是『我們的國情不同』，這種民族的偏見差不多

各個民族都有。

「然而中國人不是神也不是猴子，中國人所組成的社會不應該有什麼不同」。

因此，由他所研究的結果，中國社會的發展，一樣是由原始共產制，而奴隸制，而封建制……，並無什麼「國情不同」之處，從而我們的未來的去向也看得清清楚楚，再不用不着待徵。岡特聖之流想從所謂「國情不同」裏面去找特殊的階級——如所謂「土大夫階級」，以及其他曲解中國歷史的種種說辭，在郭先生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出版後，都不能成立了。雖然郭先生對於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不見得百分之百的正確（例如他把西周時代認為奴隸制），但如果能隨郭先生安心研究下去，對於中國史學界的貢獻之大，將是無可限量的，我相信。

然而抗戰起來了，郭先生拋掉商鵠周鼎，妻子兒女，聽回國來，參加抗戰。他早已認清過往的來程，決定未來的去向，所以毫不猶豫，絕無動搖，把整個軀殼，整個靈魂，獻給中華民族。這四年多來，郭先生的努力，是衆目共觀的，郭先生在工作中所遇

到的困難和阻礙，也是大家所想像得到的，然而他決不會退縮，也決不會悲觀，他決不會退縮，他的精神，爲反抗的烈火燃得分明。尤其值得敬佩的，他仗着如火的熱情來參加抗戰，但並未停止他的學術研究的工作，他曾親身去發掘漢墓，他曾爲了感證光斬子故事而查考過不少古書；也並未停止他的文藝工作，他還在寫詩，還在寫文藝論文。抗戰是長期的，郭先生就不肯在長期抗戰中發了呆一段時間。一定要像郭先生那樣，纔不愧爲一位文化界的先進，纔可以做青年人的模範。

郭先生今年五十歲了，中國人一向把五十歲看作人生的重要階段。孔子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說，「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矣」。以郭先生過去的成就而論，我們相信五十歲以後的郭先生，在中國學術史上，在中國文藝史上，一定有更大的貢獻。——在這裏，除祝郭先生五十誕辰外，並向他致民族的敬禮。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于桂林。

（附）郭沫若先生來函

雲彬的文章說到我「對於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的劃分，不見得百分之百的正確」，是很正確的。例如我從前把殷代視爲民族社會的末期是未免估計得太低，現在我已從歷明殷代已有大規模的奴隸生產存在了。但我「把西周時代認爲奴隸制」，則是非常正確的，雖然現在還未被人公認。但我也並不着急，我相信早遲會得到公認的。所謂「封建」這個名詞的新舊兩觀念在現代多數學者中依然還混淆着，而對於奴隸制也沒有正確的把握。古時是把三代都認爲封建制度，因而前些時候有有些人認爲中國並無奴隸制。近年來稍稍進步了一些，有的認中國古時是有奴隸制，但只有家內奴隸而無生產奴隸，有的說奴隸制未及完成便鞏固化了。其實都是因爲研究沒有十分周到。僅僅只有家內奴隸是不能稱爲奴隸制的，奴隸制要有大規模的生產奴隸方能構成。問題是在中國是不是有過大規模的生產奴隸，西周時代是不是以奴

談來做過大規模的生產？

中國文字上所剩下來的是奴隸，如奴如隸如僕如奚等等，的確都是家內的；但也有一部分昇華為政治上的高等職位，如宰如臣如僕（古時有太僕）等，這正是一部階級統治史的轉捩遺痕。但中國古代是以「庶人」，「黎民」為生產奴隸這一點却不會被人遺殺，雖然經我遺殺了，但一般的學者還怔於成見而不加以公認，實在是一件小小的遺憾事。我現在不想把這個問題來在遺屍展開，不過我也想藉這個機會略略的解說一下。因為人民就是奴隸這一點不得不到了解，中國的古代社會是永遠研究不出一個眉目來的。我且舉一個絕好的銅器銘文上的例子吧。

有一個有名的「大盂鼎」，是康王時的大臣名叫「盂」的，受了康王的命賜，因而作器紀錄所留下的東西。那裏面在種種賜品之內有這樣的一項：

「錫汝邦司四伯，人鬲自厥至於庶人六百五十又九夫」。

這包含着「自厥至於庶人」的「人鬲」，無須乎多作解釋，就是奴隸。彝銘中

又單稱爲「厲」，逸周書世俘解作「厲」（不是曆字！），也就是其它文獻上所稱黎民的「黎」，古文家作爲「民獻」而今文家作爲「民饋」的「儀」（獻字是兩字的錯誤，儀字是兩字的音誤）。但這裏面「庶人」是包含着的，而且是最下等。再看左傳昭公七年引載楚國季平無宇所說的十等人吧：

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皂，皂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

自阜以下都是奴隸；而從事牧畜生產的圉牧還沒有入等。從事農耕生產的更沒有提到，這個十等觀可見還是相當古的觀念。孟鼎中的「敷」，相當於十等中的「與」，而「庶人」呢，則應該就是從事於農耕的老百姓。左傳上也還有些材料，幫助我們作這樣的解釋。

「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襄九年）

「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卑，魯牧圍皆有親屬以相輔佐」。(襄十四年)

「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士田十萬，庶人工商塗，人臣隸圍免」。(襄二年)

從這些看來可知庶人是「力於農穡」的，工商尚不在其內。在庶人以上為貴族；自庶人以下則儕於皁隸，庶人的身分是什麼，是已經表現得夠明白了。但這些都是春秋末年的文獻，在那時工商的分業已經發展了起來，使這兩種人當然成爲了農以外的兩種身分，這已經值得我們注意，而庶人的身分也提高了，是更值得我們注意的。在孟鼎裏面「庶人」是最下層，而在春秋末年則已躋于工商皁隸之上，這兒正含孕有一部偉大的產業革命史。

總之，在古所謂庶人兆民本是生產奴隸，這點須得認清楚。待庶人的私產發達，由奴隸身分解放，才成爲了一般的平民。而有奴產的庶人也可以有私有的家內隸

奴。看獯鬻民族吧，黑頭骨有白頭骨爲「娃子」，而「娃子」也有著「娃子」的，故庶人能昇居于阜隸之上了。

奴隸制的變革是在西周末年開始，春秋戰國數百年中都是這個變革過程，到秦漢以後才真正完成了。春秋時文化最高的魯國，在宣公時才「初稅畝」，鄭國到子產時才定租賦，秦國直至商鞅時才定田賦，這些是值得我們注意的。租稅制的開始即是現代意義的封建制的開始，在這之前，奴隸制的生產是無所謂租稅，舊時有夏殷周三代的稅名，那只是戰國時代的學者「託古改制」而已，古實無其證也。

關於這個問題，我自己不會有系統地來敘述過，這是我的憾事。但我並不著急，其實早遲總要被人公認的。只要我有多餘的時間，我早遲也很想把這些問題有系統地敘述出來。

郭沫若 三十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 ◆ ◆ 書叢草野

集地此時此

元 二 著 初 互

夏衍先生的評述，極深極透，自成一格，早經社會人士好評，當經稍少誇張，且以初稿訂。此集為作者自選之散文結文集，共二十四篇，均最近一年所作。

感覺的音響

本集共分四冊：第一冊為隨感，第二冊為女子，第三冊為女子，第四冊為女子。此集為作者自選之散文結文集，共二十四篇，均最近一年所作。

秘奧的史歷

元 四 著 姪 計

本書乃作者四年來所作歷史之結晶，長短共三十餘篇，計五萬言。作者于文學各部門，涉獵至廣，而尤以歷史見稱。筆墨靈灑，有以至也。凡愛好文學者，不能不乎此一讀。

- 著林林……歷史的奧秘 (元 三 價 定)
- 著姪計……塔與蛇 (元 三 價 定)
- 著魏家何……索隱河 (元 六 價 定)
- 著張文馬可……密通 (元 六 價 定)
- 著趙孟……東夜長 (元 五 價 定)

版庫字第一六七號

行 發 雜 版 出 廠 文

號 四 十 街 前 府 林 姓

野草叢書之十

骨 便 集

每册實價四角六分
郵費在內

著	發行人	發行所	經售處	印刷者
宋雲彬	夏雪清	文獻出版社 <small>桂林特約十四號</small>	全國各大書店	國光印刷廠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一日初版

廣西圖書館雜誌卷五第壹期(庚辰年第一六七號)



1978.12.00

1978.12.00